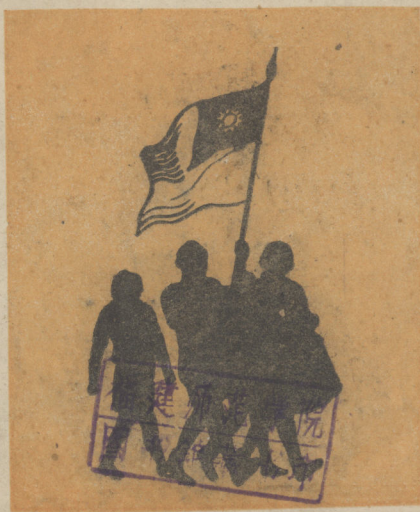


抗戰特刊第三種

青年與革命

丘 哲 著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印

抗戰特刊第三種

青年與革命

丘哲著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印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

抗戰特刊第三種

青年與革命

歡迎翻印

著者 丘

重慶北碚

哲

編行者 中山文化教育館

印刷者 南京京華印書館重慶分館

總經售 上海雜誌公司

重慶 武庫街 桂林 中北路

柳州 慶雲路 上海 北河街

宜昌 二馬路 西安 南院門

成都 祠堂街 昆明 華山南路

支店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出版

實價五角

自序

辛亥革命成功，在表面觀之，是觸發於一種民族的情感，其實革命真諦，並不如此單純。照吾國易禮所闡，革命的意義，是「正反相成，陰陽相生。」就是近代所說「矛盾的統一」，或是一「辯證的發展」。其根據乃由一種「動的宇宙觀」（或自然哲學），和「易的人生觀」（或社會哲學）而來。所謂宇宙，所謂社會，是不斷變化的。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固無論是自然法則，或歷史法則，容納了異質的東西，就會起一種作用，所以說：「和能生物，同則不繼。」易之乾坤二卦，因正反純一，孤獨無偶，竟無吉詞，就是這種道理。但是要有二種以上不同的在一起，然後方有和的作用。即互相感應（矛盾的發展）終必和合，而生出更高級的第三形式（矛盾的統一）。這第三形式，出於前二

者，而又不與前二者之一，或二者之和相同。由矛盾的發展到矛盾的統一（或矛盾的解除），其變化過程之特別迅速激烈的，就是革命。

自一七六四年，瓦特氏發明蒸汽機以後，利用王權時代所孕育的私人資本，發展了社會生產力，一方面積聚了龐大的財富，成爲一種新興經濟勢力、社會勢力、及政治勢力。此種新的力量高漲之結果，使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及整個歷史，均發生極大的變動。在文化及軍專諸方面，都有重大的改革與進步。所以法國和美國就相繼發生革命，產生了現代民主政治。到了十九世紀十年時代，火車汽船相繼發明，更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此種文化，因汽船的便利，動盪到亞洲，乃有中國的太平軍革命，和日本的明治維新。而中日戰爭、戊戌政變、義和團事件，亦不斷發生，遂促進了清廷顛覆，中華民國之成立。

歐洲產業革命以後，資本主義機械工業，益形發展，遂訓練了工人的組織力，提高了工人的文化，刺激了工人的政治慾望，於是便發生社會主義。然而中國

在辛亥革命之時，資本主義尚未發生；民主政治沒有社會經濟的基礎與支持，不便於運用；社會主義更不易爲人所了解。當時指導革命的思想，是對於歐美資本主義發展後的民族主義與民主政治的嚮往心。所以孫中山先生以先覺的地位，雖倡導社會主義（民生主義），然在當時僅爲一種理想，很少人附和與實行。

但是民國成立不到三年，歐洲就發生了大戰，資本主義的弊害，完全暴露。一九一七年蘇俄爆發社會主義革命，成立了第三共產國際。一九一八年歐戰結束，國際聯盟成立，民治主義陣線及民族平等口號，甚囂塵上，各國社會黨陸續躍登政治舞台，於是社會主義與國際主義，又盛極一時，同時朝鮮獨立運動，日本的米風潮，給以中國革命青年一大刺激，因此民族主義、民治主義、社會主義，都成爲熔鑄中國青年思想的原料。孫中山先生本應天順人的睿智，改組國民黨，完成三民主義，果然一時風從，雖孫中山先生去世，而有蔣委員長繼成遺志，卒能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在這個時期，孫中山先生發明的三民主義，已日趨成熟，運用上又有蘇俄革命供參考，就要全部實現，也非難事。因為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先生斟酌損益中外的良法美意，自出機杼而成，即是說：對於中外思想制度，都予以批判的接受，而另加以創造，成爲一種特別適合於中國的指導思想。

第一次歐洲大戰後的大變局，由於蘇俄的產生，存在、與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警惕、退讓、與變化，以致全世界有一種小康的景象。但是小康時期，由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摩盪、感應，復產生一種極權政治勢力，在十年的短期間內，成爲一種恫嚇人類和平的力量，使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同感不安，而且最先受恫嚇的，就是中國。九一八的瀋陽事變，就是這種恫嚇迫害的烽火，中國也因此產生了全國協和精神，成就了蔣委員長偉大領導權，此種最可貴的全國協和精神，經七七蘆溝橋事變，而日趨鞏固。

我們抗戰將近三年，最後勝利之獲得，成爲必然性之要求，而革命青年實負

有絕大的責任。余在青年時期對於革命，如潮州黃崗之役、廣州三月二十九之役及光復廣東之役，都曾躬與其事。本此革命過程中十數年之體驗，追懷往事，探討將來，爰著斯篇，以闡明中國文化及現階段的認識，并指出 蔣委員長承繼孫中山先生的思想，爲青年立身處世、愛國保種的楷模。期待全國革命青年，循此邁進，而達到「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之目的。

丘 哲自序於重慶行都

遠東中心 美日關係的觀察

陳玉祥著

實價八分

本文共五節，分述以遠東為中心之美日關係的各方面。全文注重美國之遠東政策，從而揭發日本之陰謀，檢討美日之對立，痛陳美日邦交之利害，層層推進，如撥烏霧，而白日自明。本文作於去年十月，因印刷困難，今始出版，但本文對於美目前途之觀察，均語無虛發。

現階段之徵兵問題

崑崙政著

實價八分

徵兵問題，為抗戰期中極關重要之問題，無待贅言。作者從政有年，以實際經驗所得，分析此問題之癥結所在，并提出種種改進辦法，觀察精到，思想周密，誠抗戰建國之良圖，救弊補偏之藥石，非紙上談兵者所可同日而語。愛國志士不可不讀，辦理兵役行政者尤不可不讀也。

敵國中小商工業的破滅

章特宇著

實價一角

本書首敘敵國中小商工業在敵國之重要地位，繼闡明其破滅之原因即公債發行、租稅苛重、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原料缺乏、以及大企業之競爭等，並論其破滅後敵國經濟和治安所受之影響，最後則敘明敵國中小商工業在侵華戰爭中前途之暗淡及其國家之整個危機。析理評密，堪稱佳著。

抗戰叢刊

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戰爭
英美合作經濟計劃的研究
國民兵訓練計劃
戰時的地方自衛
怎樣粉碎日寇的以戰養戰
抗戰與地利
抗戰文藝概論

郭節述著 實價一角
陳玉祥著 實價六角
何會源著 實價八角
何炯著 實價八角
陳正謨著 實價八角
宛書城著 實價八分
趙清閣著 實價六分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印

青年與革命 目次

- 一 中國青年與中華民族……………(一一—三三)
- 1 青年時代的自然責任
- 2 中華民族的青年
- 3 蔣委員長與現代中國青年
- 二 中國青年與中華民國……………(一四—二五)
- 1 中華民國
- 2 保衛國家
- 3 青年與服務國家
- 三 中國青年運動……………(二六—三三)

四	中華文化與革命……………	(三四—四一)
五	中國青年對於中國文化之認識……………	(四二—六三)
	1 社會的人道主義	
	2 行爲的理智主義	
	3 宇宙的辯證說	
	4 信善誠一的宗教信仰觀	
六	中國青年之任務……………	(六四—七四)
	1 知的工作	
	2 仁的工作	
	3 勇的工作	
七	中國青年之奮鬥(捍衛和平)……………	(七五—一〇九)
	1 和平爲中華文化的基礎	

八	中國青年之自信……………	(一一〇—一四六)
1	自信的解釋	
2	中國人的自信	
3	中國青年的自信	
九	新生活、新文化、革命……………	(一四七—一七三)
十	現代青年之幸運……………	(一七四—一七五)

青年與革命

丘哲著

一、中國青年與中華民族

1 青年時代的自然責任

一個人的生存期，可分為四個段落：

- (A) 二十歲以前為兒童期
- (B) 二十歲至四十歲為青年期
- (C) 四十歲至七十歲為中年期或成熟期
- (D) 七十歲以上纔是老耄——老年期

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蔣委員長創立三民主義青年團，規定

團員年齡爲從十八歲到三十八歲，此種青年年齡之規定，約略相當於孔子由『志於學』以至『不惑』的一段時期。

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所以三民主義青年團所規定的青年年齡，又正相當於由『弱冠』以至『強而仕。』

由此可知，蔣委員長對於青年年齡的規定，原是折中孔子的話，和古禮所記而來。因此我們可以明白青年時期，是由求學以謀自立，而達到認識確定、意志堅強、可以單獨負責作事時期。在這段時期第一要立志。

孫中山先生五十九歲去世，而遺囑上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在孫文學說，中山先生曾經這樣說：『余自乙酉（一八八五年）中法戰爭之年，始立推倒滿清，建立民國之志。』可知，中山先生立志革命是在十九歲時，則我們可以明白，中山先生立志，正是在青年時代。

蔣委員長在辛亥革命時，已經同陳英士先生負上海方面的軍事責任，則我們知道 委員長立志革命，是在二十歲左右，也正是青年時代的初期。而 委員長創辦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擔負完成革命的時候，正是在三十八九歲時的事。

所以 蔣委員長之規定青年年齡，為從十八歲到三十八歲，乃是根據古禮和孔子的經驗，一方面是根據 中山先生及 委員長本身的經驗。

從青年年齡規定的來歷上看，就可以知道從十八歲到三十八歲的中國青年，真是不能妄自菲薄，其責任實非常重大！按生理學及教育學的研究，兒童期的前半，是以生理的發育為主；兒童期的後半，是生理的發育與個人生活技能的發展兼重，可以說是受保育的時期。青年期，人的身體與智能，仍是在向上發展的時期，其生活技能正在充分發展，而社會智能，逐漸成長的時期，可以說是「專」與「學」兼重並進的時期。到了成熟期，則個人生活技能，固已經純熟，而社會智能，也已豐富，所以是以身示範，領導工作的時期。到了衰老期，則一部份健

康狀態不良的人，因工作能力已盡，應受社會充分頤養；一部份健康狀態良好的人，也因體力衰退，勞作能力缺少，然而對社會已盡了長期的努力，已經把一切貢獻於人類，閱世甚久，一切經驗都極充分，所以應受社會一般人士最崇高的尊敬與信仰，在精神上與道德上也須受其領導。

青年時代，因為體力與智力都在向上發展，所以是工作（包括治事與治學）能力最旺盛時期。因為體力與智力都在向上發展，所以一切慾望也最強。因為慾望強，所以希望最大。因為體力與智力均在向上發展，所以覺得前途無限，能突破一切障礙，蔑視一切困難。然而，正因閱世不久，智力還在發展期中，所以就容易發生錯誤。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正是說：學習了十五年之後，到了三十歲時，個人生活技能，纔算已經馴熟，生活上纔可以自立。所以中國古禮規定男子三十而娶，也就是因為三十歲的男子，生活纔能自立，纔能對妻子負扶持撫育的自然義務。孔子說：「四十而不惑。」正是因為人到了三十

歲，個人生活技能雖然可算充分，而必定要在擔負家庭義務十年之後，對於人類社會纔能逐漸明白認識，處世接物，立身待人的經驗，纔能充分。所以大學上說：『宜其家人然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然後可以教國人。』因此孔子所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的話，正是經驗豐富的至理名言，正是深知艱苦的教訓。

因為青年是在體力智力都在發達極旺盛的時代，希望無窮，前途無限，所以是一個民族中最可寶貴的一代人。老年的一代，將自己的經驗閱歷昭示中年期的人；中年期的人體察老年人的意見，自己來工作示範，領導指揮青年這一代人；兒童們又直接在這一代青年人撫育扶持之下。因此，青年的一代，是應該一方面服從領導，接受訓練；一方面也要在工作（包括治事治學）中間改良本身，教育自己；又一方要提攜同輩，撫育兒童。這種責任，是極其繁重的責任，也正是體智均向上發展的青年最自然的責任。

2 中華民族的青年

在孔子時代所公認為同種的，除姬姜之後以外，只是炎黃胄裔、唐、虞、夏、商之後。這些中華民族的祖先，大都聚居於今日黃河沿岸，及漢水流域。而在這一地域中，當時還有公認的許多異族雜住。春秋時代，秦在陝西，楚據豫南，都逼近周室，似乎當日都不甚認為同族。其實中華民族的祖先，是由東西南北各方面匯合起來的。在四五千年前，以黃河中游沿岸作樞紐，發明了原始的文字，以後借這種文字，敘述歷史，事實上祇能由近及遠，所以中華民族也就以黃河中游沿岸作歷史的出發點，而和這地區生活情形不同的，或者就認為他族。因為古代利用厚生的方法不精，不能利用自然物質，養育多數人口，所以二千四百年前春秋時代的中國，僅包括今日山東、河南、山西、河北、安徽的一部，而人口數目，最多相當於班固所計算邦畿方千里的六千四百萬人。當時川康一部份民族，不甚與中國相通，情形不明，但我們就言語學上研究，已經知道遼、緬、藏、是

同一系統，而且既行的中國語文中，還有很古以來，就相沿的蒙、韃、土、各種成分，甚至遠古文化，還可以在巴比崙與埃及找到因緣。

我們的祖先以二千四百年的努力，因文化發展及中國文字應用範圍的推廣，已經認明漢、滿、蒙、回、藏、苗、夷、倮、許多種族，都有同血統的關係，雖因居地遼遠，氣候物產不同，語言生活稍異，而終於凝為一個四萬萬五千萬人的中華民族。自唐以後，中國和南洋的交通更繁，中華民族逐漸向南推進，若將國外的混血成分計算在內，則與中華民族為血緣之親的，大概有六七萬萬人。以中國的面積計，現在較之二千四百年前孔子時代的中國疆域，當已擴大至三十倍以上，而經過二千四百年的時間，人口的增加不過十倍，比較近四百年來東西各強國人口增加率，相去很遠，就是在地域的擴張上，中國也比較各國差得很多，這種事可參看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演講，及各種統計圖表。

現在地球上凡可容人類生存的地方，大概都已有人類生息其間，就是還有空

地，也由各民族閹禁。中國的傳統思想，是保境安民，不尚開疆拓土。我們沒有分外的土地慾，然而我們有外禦其侮、守望相助、保護祖宗廬墓、敬恭桑梓的義務和決心。這是中華民族二千五百年前相傳下來的遺教，也是現代中華民族青年的天職。

『保衛本身，繁衍族姓，』是一切有生之物的天然職責。青年人因為年富力強，對於這種天職，尤其負有極重大的任務。我們自然非尊重與敬慎這種職責不可。中國二三十年來都是注重以『以孝治天下』，而『不孝莫大於無後』，所謂『保我子孫黎民』，所謂『撫世長民』『父慈子孝』是中國二千多年來政治的及社會的教條，也是遠古以來的人口政策。因為以中國物質條件言，不論抵禦外侮，或和平建設，都非有最大量的人力不可，而且也要一種自然的社會紀律。因此『孝』遂成爲民族繁衍與自衛最重要的原則。而且『孝』不僅是個人或一家的瑣事，且是最重要的國防教條，與建設的根本。惟其如此，所以與繁衍種姓有關的修身齊家之道，

乃成爲大學的中心條目。

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演講中，極以中華民族人口減少傾向爲憂，這確是中國主持政治、教育、經濟、保健、保安的人，所應深切體會警惕的，也是近代中國青年所應深切體念的。

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演講中說：「民生就是人民生活，社會生存，國民生活，羣衆生命。」事實上，民生也不外是民族的生息，因爲民族生息，包含了民族生命的保存與延續，最合於近代科學的法則，同時也最合於古聖先賢的教訓。

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中說：「古代的聖人，都是發明家。聖、賢、知、庸、愚、劣的地位確定，使得到自然的平等。」他主張將權能分開，有權的信任有能的（實際是信任聖人、發明家、專門家，）其實也就是因爲聖人能撫世養民。秦誓說：「若有一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尙

亦有利哉！」這說話正可以與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相符：「有技」的是「專門家」、是「專才」、「彥聖」的是「發明家」、是「通才」。民權政治，正是要容納專家及發明家的「有技」、「彥聖」的人，來「保我子孫黎民」，使民族得以生息，以保障「人民生活，社會生存，國民生計，羣衆生命。」

中山先生曾經說過「我是爲民生主義而革命」的話，又在建國大綱上開宗明義便說：「建國之首要在民生」。而且民生主義，和建國方略中的物質建設，更明顯的處處爲民族生息着想。可知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係以「民生」爲中心，即以中華民族的生息問題爲主體，實無疑義。

3 蔣委員長與現代中國青年

蔣委員長在九一八以後，民族生存危急的時期，倡導新生活運動，也很顯明的，意在保障與改善民族生活。同時，委員長又提倡節約運動，與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用意自然也是使中華民族便於生息。而抗戰以後由委員長親自領導

的三民主義青年團，更是意在養成許多『有技』『彥聖』的青年幹部來推行上述之運動，具體實現以『民生』爲骨幹的三民主義。說文：『聖，通也。』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訓練，將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並重，其目的自然是在於養成革命的通材，即養成『保我子孫黎民』的『有技』而『彥聖』的人材。

自一七六四年蒸汽機發明後，人類藉機器的力量，改變了一切技術。機器的運用雖簡易，然而若不熟練，就容易發生很大的危險，故工作遂趨專門化。因機器工作迅速，而出品數量過大，需要整個地球上的人類去迅速消費，所以促進了人類的世界知識學問的材料無限的增加。又因機器應用的結果，在交通方面縮短了地面的距離，使人類的關係日趨密切，複雜的人事的智識，就成爲迫切的需要。因機器工作增加人類的力量，所以人類制御自然的力量就增強了。也因人類運用機器，能製造精密的器械，擴大了人所借以認識宇宙萬物的官感，所以認識宇宙萬物的力量也增長了。因爲學問的材料增加了，人事的關係複雜了，制御自然

的方法加多了，所需認識的宇宙萬物廣大精深了，而個人的精力有限，決不足以吸收或從事時勢所需要的各種智識，因此學問也就愈分愈密，智識也就日益專門化了。所以，在經濟界與文化界，因機械發明而起革命的今日，也急切需要能精於一業，遂於一學的「專才」，亦即要求養民牖民的「有技」之士。所以 蔣委員長也極言專精一藝之重要。

人類因為能明白自然法則而遵守之，才能駕御自然，也猶之明白人事法則而遵守之纔能治理人事。自然力與羣衆力一樣，偶一不慎，便流於暴。現在，駕御自然力愈多，所需因應的人事愈繁，則愈要明白其一切性能法則而嚴加遵守。遵守法度，必然有賴於專家的指揮監督，一如十字路口交通警察之指揮行人，戰場上將帥之指揮作戰。所以，不違人情範圍行爲的「禮」，與適應環境以求公益的「義」，就居於四維之首。禮義要點，在守紀律，所以在機械科學文明的現代，一個民族要求生存，所需要的智識、技能與道德，要比二千四百年前需要更多。何況中

民族在危急的今日，所需要的智識、技能、道德、訓練、更爲迫切。孔子志於學後二十五年，始能不惑，我們現在求學的環境比從前便利些，治學的工具也精巧些，同時智能範圍也較擴大而精密，精神的修養也更嚴格，所以更當勉爲通材或專才，以應民族生存，及本身生活的需要。

我們的民族現在幸而有偉大的蔣委員長作最高領袖，而中華民族的青年，尤其需要發揮其天職的向上活力，在最高領袖指導之下，各盡所能，負責任，守紀律，明禮義，知廉恥，以圖中華民族之生存，更進而作完成中國革命之大業。

二、中國青年與中華民國

1. 中華民國

國家是一個民族『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的最高組織。現今雖因機械工業發展，將全世界的民族都親密的聯繫起來，國際的關係漸漸的組織化，然而究

竟人類的理智與感情，是沒有發展到消滅民族偏見，將對內的忠恕之道，推行到國際行爲上。國際間依舊瀰滿了自私自利、爾詐我虞的暗雲，所以弄到全世界杌隉不安。因此國家仍是民族求生存的最大最高的協團體。要懂得中國古代的國家思想，先要知道東西各國以前都是『君』與『國』兩個觀念混合不分。因國家觀念較抽象，而君主觀念極具體，所以常以君代表國家。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法國路易十四所說，『朕卽國家』，不過是十九世紀前流行的思想，而盧梭的民約論，是後起的新說。因此荀子說：『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人用何也？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分工）。分何以能行？曰：以義（合作）。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人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君者善羣也，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良，羣生皆得其命。』這就是中國的國家原理。國家這個大羣之成立目的，是在善羣勝物。同時中國人也說：『積身而成家，積家而成國』

，積國而成天下。」這是說：國家是國際組織的一部份，然而要國際間有組織，先要國內團結，組織鞏固。所以「協和萬邦」與「平天下」，先要親九族，和治國家。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故國際組織的單位，自然還是國家。孫中山先生的國家論及國際主義論，也正是根據帝典與大學的精義。

中國的國家說，不是排外的，所以孔子說：「禮失而求諸野，樂失而求諸夷。」中國的國家說，也不是賤外的，所以「子（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而且中國當時稱異族曰「夷」，絕不含輕鄙意，所以孟子說：「舜生於諸馮，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同時，中國人對外主張和平，所以詩經說：「柔遠能爾；」孔子說：「近者悅遠者來。」如果國際間發生了問題，則照孔子說法，應當是「凡有國有家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故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則孔子極力稱讚他說：「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至於國家權力對內的作用，論語所載最詳，約舉之，如「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又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謹權量，慎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悅。」

帝典上說及舜的運用國家權力，對內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已穆，平章百姓。」所謂德，卽施政的意義，正如大禹謨所說：「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金、木、水、火、土、穀六府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至於孟子所主張

的「仁政王道」，是「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又說：「發政施仁，……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此類保民之說極多，舉不勝舉。

至於政治上舉賢去佞，除暴安良的作用，孟子說得最好：「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因爲中國古代的國家功能說，是一貫對內保育民族生活，對外保衛民族生存

，所以國語極力稱讚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楚自克庸以來，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也受國語特別的讚美。

中國的政治，雖主張「民爲邦本論」，但有時也主對外戰爭，與擴張領土，不過要以外國的真民心意爲本。孟子是最反對以力服人，爭城爭野以闢土地的，然而孟子上說：「湯始征自葛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俟我后，後來其蘇。」「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取之如何？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因此中國的政治哲學，是澈底的國家民本論，所以孫中山先生在十九歲時，就立建立民國之志，以後確定國號爲中華民國，以三民主義爲立國最高原則，

自然也是根據數千年來的政治哲學。而且國家首先應注意「民信」，其次就是「民生」，所以中山先生晚年首先完成孫文學說的心理建設，其次就是物質建設。而「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的話，也爲中山先生所特別稱引。

實在，中華民國乃數千年來先聖先賢所昭示，而由孫中先生努力完成的。

2. 保衛國家

從語源學上研究：「國」與「城」二字，同以「或」爲字源。說文：「國，邦也。」「或，邦也。從口，（古圍字），從戈，又從一。一，地也。」「城，或，又從土。」「邦，國也。」所以人類在土地上劃定疆界，而守禦之，這是「國」的原意。又在春秋戰國時代，「國」「都」與「城」也是同義字，「城」是通稱，「國」是統帥所駐的城，「都」是部將所駐的城。鄭國祭仲說：「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這句話的意思，即是說部將所駐的城市太大了，就會威脅統帥所駐的城。「城」與「京」同意，春秋時代，祇有最高首領所駐的城稱「京」。說文：「城，以盛民也。」而其實

「城」是後起，原來的字就是「成」。說文：「成，就也。就，高也。從京，從尢，尤異於凡也。京，人所爲絕高丘也。」古時人民爲安全計，多居於高地，以避水潦潮濕，而便於守望，防外襲，外國這樣的例也不少，所以春秋時稱古代民族所居之地，曰「虛氏之虛」。說文：「虛，大丘也。」用人力作成大丘而居之，正如近代在人煙稠密的地方作防禦工事。由「成，就也。就，高也。從京，從尢，尤異於凡也。」便可以明白「成」卽「城」也。卽是一種防禦工事。「國」的古字爲「或」；「城」的古字爲「成」和「戍守的「戍」，三字結構相同，都表示執戈守險，保土衛民的意思。

在古代中國民族的繁衍移殖，略同於歐洲古希臘、羅馬所到的地方，爲了防禦侵襲，均圍高地爲疆域，築土爲丘以環之，叫作「城」。族長稱「君」，族中成年男子稱「君子」，成員稱「國人」。大族長嫡系子孫所居的大城叫作「京」。嫡系以外子孫，及功臣在京城四方分土而居曰「封建」，所築小城叫作「國」。其嫡系所居

之支族長，其名號叫作『諸侯』的意思，等於現代軍語『斥侯羣』。這些諸侯的其他子孫，另外在『國』四周立更小的城而居之，叫作『都』。其名號叫作『大夫』，意義同於現在『大人物』，或『偉人』，定居於『京』，或『國』。在大族長或支族長左右的高級指揮人員叫作『公卿』。在公卿大夫之下，任中下級幹部直接任事的都叫作『士』（說文：士，事也。）士，就是可以任事的成年男子，所以詩經上士女對稱，因此受命令直接執行保國衛民的工作，都是士的事。

當時中華民族的成員，既叫作『國人』，青年以下的男子，就稱『國子』。教育國子有專管機關，和專管人員。教育的作用是『養士』，和『取士』。社會上的上等人是『國士』。人的最好稱譽是『國士無雙』。所以國子求學的目的是學爲士，正如荀子所說：『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所以國子就學的意義，是先求做到能擔負國家的事務，最後是求完成作一個人倫師表的通材。

3. 青年與服務國家

中華民族，經過二三千年的努力，由古代那樣的國，造成了現在這樣的泱泱大國，這是最可寶愛的遺產，國人對於國家責任更加重大。因為國家的作用是善羣勝物，是使羣生皆得其命的，所以一個人離了國家就難生存，因此為國家服務，乃國民的第一天職。

為國家服務，中國原來叫作「仕」。說文：「仕，學也。學，覺悟也。從教，從門。門，尚矇也。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從支從孝。孝，做也。（亦即古文效字。）所以「仕」是一方學習，一方作事，在作事中間學習，也以學習提高作事的能力。學與事不分，即知與行不分；以學治事，亦由事得學；知以利行，行以證知。要勉強分開，也祇能如孔子所說：「仕（事）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優即憂，說文：「憂，和之行也。」其原意是樂舞時，步調、心情、容貌，合於音樂的意思，所以說：「和之行也，」加人旁，作倡優解，是說優伶容貌舉動，合於音樂

節奏。因「優」的意思，爲容貌舉動與樂相和，引申爲妥貼意，亦如俗話所謂「合拍」。憂，又從憂。憂纒，古時是作憂愁解的。「憂」字從頁（面貌），從心，意思是提心在意，現於容貌。優伶有時也是留心細聽音樂，行動纒能妥當合拍。因此憂，從憂，與文（說文：文行遲曳文文象。）而意爲「和之行」，加人旁而爲優伶之優。故「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這句話的意思，應當解爲「作事而要提心在意，求妥貼，則需學習。學習而需提心在意，求妥貼，則需作事。」因爲提心在意以求妥貼，就是說作事時發生了不馴熟，不能得心應手的情形時，自然還要學習，看人家的榜樣。模倣學習的時候，發生了這樣的心情，就要去作事。懂得這個解釋，也就可以明白論語第一句話：「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的意思。因看榜樣，弄明白了之後，再實地去幹，就可以得心應手，不求工而自工，不會發生「優」的現象。讀書并不能盡學的能事，所以孔子說：「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孟子也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專門學習工作而不用

腦筋，或專門用腦，而不學習工作都是不夠的，所以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古網字），思而不學則殆。」專學作事，而不用腦筋，自然祇覺得頭緒紛繁，茫無頭緒，不得要領，如魚在網；專門思想，而不從實際工作中去研究，那就要發生空想的危險，所以孔子又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孔門的學問，都是實際工作上的學問，是要行的，因此子夏說：「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路也說：「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顏淵不遷怒，不貳過，孔子稱爲好學第一，而德行第一，也列顏淵。從此可以知道孔門學與行不分，學與事不分。而且此種治學與治事的精神，即「手與腦并用，研究與實驗不分」的方法，正是現代科學上的重要方法。

青年是學習的時代，也是作事的時代，無論是研究甚麼學術的，無論是從事那種職業的，都是爲社會服務，爲民族服務，爲國家服務，都應該從實際學問與

實際工作上，勉爲『國士』，以各種智識與各種技能，去捍衛國家。

古代中國教國子以『禮、樂、射、御、書、數』，原是文武不分途的；現代中國也用這樣的辦法，所以現代中國青年，無論是從事何種和平工作的，都應學習『射御』的精神，接受軍事訓練，完成『智深、勇沉、允文、允武』的近代國民資格，也正承繼中華『國士』的遺風。

蔣委員長所手創的三民主義青年團，正是採取文武兼資的訓練方針，將各種職業的青年，養成知、仁、勇、的中華『國士』，而求達到衛國與建國的目的。

三、中國青年運動

青年精力充滿，感覺銳敏，是一個民族中最活躍最精銳的一部份人口。且其年富力強，爲社會國家服務的時期很長，故年齡較大的一輩，應將自己的學識與經驗，都傳授給青年，也應將自己所受的痛苦教訓，告誡青年，同時將自己的希

望和未完成的艱難責任，也付託與青年。無論那一個民族，無論那一種信仰，一切有益的教訓，大都是爲青年而說，所以開拓民族、國家、和人類的光明前途，是青年無可旁貸的責任。爲担负這種最大的責任，青年人也不可參照前輩的經驗和教訓，以避免許多不必要的失敗，保存民族、國家，和人類的元氣，使光明的前途容易到來。

古代中國優秀的青年叫作「士」，而且也包括在成年男子通稱的「君子」以內。「士」與「君子」的條件是：「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又「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致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然後已，不亦爲遠乎？」

因此古代的青年，在受教育的時代稱爲「國子」（從晉代到前清，國立大學均稱國子監），都要受「知、仁、聖、義、中、和、孝、友、睦、嫻、任、卹、禮、樂、射、御、書、數」的教育，就是訓練青年服務社會民族國家，發展民族

文化。所以中國的青年，歷來負着重大的責任。中國的青年既然負着這種重大的責任，因此近百年來，對於中國文化，有重大的貢獻。這種事實，大概可以分四段來說：

第一；自從一七六四年蒸汽機發明以後，十九世紀十年時代，火車與汽船相繼發明，歐洲方面的新文化，本已因蒸汽機的發明而蓬蓬勃勃的發展，自此更因汽船的便利，將新的文化思想和工具迅速地運到東方。當時廣東是東西文化的接觸點，許多青年都感受了西方文化的刺激，所以一方面有容蕓甫先生等的出洋留學吸收西洋文化，一方面有洪秀全等以基督教思想而發起民族革命。這可以說是近代中國青年運動的前奏。太平天國的基督教思想的民族革命，支持了十九年，使中國社會發生一大波動，就是反太平軍內的分子，如李元度之流，也感受了西方文化的大勢力，這可以說是中國青年運動的黎明期。

其次：太平軍運動及五口通商，復促成了中國加緊吸收西方科學機械文化的

機運。在太平軍事時代，兩方已既採取西式武器，而軍事停止後，久已回國的容純甫先生就勸反太平軍領袖曾國藩，派遣留學生出洋，同時在國內，也購置汽船開辦機械工業。至太平軍舊部，則多遁逃南洋、歐美等地，一面組織洪門名義之互助團體，一面吸收西洋新文化。自太平軍事結束，近鄰易於受外力影響的島國日本，因採取西方文化的結果，不到三十年功夫，就戰勝清廷。我國青年震於西方文化的勢力，大批出洋留學，同時海外太平軍的子弟又已發展了洪門的革命組織。孫中山先生提挈這兩部份青年，組織同盟會，卒能完成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大業。這是近代中國青年運動第一次的大成功。

這次偉大的青年運動，因清廷餘孽與外力相勾結，在一年多的革命高潮之後，就受了嚴重的打擊。然而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愈挫愈奮，加緊海外青年與國內青年的組織和宣傳工作，果而推翻了袁世凱的帝制，并監視舊式軍閥的反動。同時學習軍事的青年既深入各種軍隊，而從事文化事業的青年，又深入各種文

化組織，終於在民國八年五月四日，以反對日本侵略為發火點，爆發了偉大的青年學生運動，高揚新文化的旗幟，開拓中國的新前途，醞釀了中國的新機運。當日孫中山先生因勢利導，著成建國大綱，包括心理建設、社會建設、與物質建設三部份，以為青年運動的指針，逐漸成熟了國民黨改組的機運，遂於民國十三年容納大部份「五四」運動時代的青年，共同從事國民革命。因為孫中山先生能以極科學的態度，斟量國情，用迎頭趕上的精神，採取最新文化，融會貫通，而三民主義遂以完成，全國青年也就風起景從。不幸孫中山先生不久去世，而蔣委員長卒能承繼遺志，於民國十七年完成全國統一的大業。這是近代中國青年運動第二次的大成功。

自民國十七年統一將近完成，日本就心懷忌嫉，而有「五三」的濟南事件，接着又有皇姑屯的炸車案，以後連年播亂，終不勝蔣委員長宏謀遠略。後來爆發瀋陽事變日軍強佔東北，為反抗侵略，中國青年運動，又風起雲湧了。自從十

七年中國統一完成，一方面青年有優良的環境，可以在文化、政治、經濟、軍事方面，從事合理的工作；一方面也有一部份青年深入民間，領導組織民間的力量。然一至日本侵略發動，全國青年皆逐漸要求更嚴密的團結，同時需要適合新環境的行動準則。於是 蔣委員長乃根據中國文化，按照三民主義精神，倡導力行哲學，發起新生活運動。 蔣委員長在日本少數軍閥橫行無忌的時候，雖百方開導，未能馴服狼子野心，但對內以精神感格，卒能使國內青年凝成一片，所以有二十六年全國大協和的局面。正因全國青年皆尊崇中國優良的文化傳統，及擁護 蔣委員長為唯一最高領袖，日本少數軍人更覺無從再施二三十年來在中國挑撥離間之故智，遂老羞成怒，演成七七蘆溝橋事變，於是全國青年皆集中於最高領袖統率之下，謹守中國民族四千年來的教訓，從事捍衛祖宗廬墓的神聖天職。這就是中國青年運動的現階段。

今就這四個階段，加以綜合的檢討。太平軍運動中洪秀全、楊秀清、石達開

等人物，都是鄉村青年智識份子，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本非深刻。洪秀全抱渾樸的民族思想，見鴉片戰爭的結果，西方力量伸張，而滿清勢力衰弱，僅從西方低級教士，獲得極少的西方智識，即以之煽動廣西猺山附近農民，憑假山民標桿之氣，乘清軍腐敗的弱點，直搗武漢，佔領南京。正因為滿清之能統治中國，乃在假借中國固有文化的力量，所以到太平軍興時，已支持了二百年，洪秀全等純以外來不久的基督教義作號召，與中國文化完成絕緣，所以滿清終為大多數人民所擁護。不過，幸虧洪秀全等還能因襲中國幾千年的民族思想，更加以相當的組織力量，乃能支持十九年與清廷作對立的局面。說到同盟會的領導人物，有的深研西歐文化，有的是當代大儒，能夠將春秋大義與新民族思想相結合，將儒家的民本思想，與新的民主政治論相結合，將禮記的大同思想，與新的社會主義思想相結合，所以能號召全國，完成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因無社會基礎，即無人民的新生活作依據，卒至以外國人民生活為根據的西方議會政治，不能實行盡善，釀

成民國元年至十三年之離奇民主政象。并且，太平軍運動，是前無師承，一切思想與制度，完全由少數青年運動有限的智識，自出心裁，經始為艱，所以不易有所成就。民國元年革命，亦因倉卒成功，典章制度，多由短期留學日本的青年，草草移植，中外思想還未能完全融會，因此也難於有新的創制，以及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人制宜的功効。

辛亥革命的領導者，經過許多痛苦經驗和數年體會研究的工夫，領導青年從事『五四』運動，將整理國故與研究新知的工作，打成一片，同時并進；而從事政治工作的領導者，也能懲前毖後。從『五四』到民國十三年六年之間，孫中山先生博採衆長，完成了開國以來未曾有的中華民族新思想與新制度體系，垂為中國的建國大法。所以『五四』運動，實在是中國青年運動繼往開來的一大關鍵。國民黨定『五四』為中國青年紀念日，實在有重大的意義。其特點是『繼往開來，貫通中外。』由五四運動啓迪了中華民族文化前途的原則，同時發現了新文化

必需有的人民生活張本。并且「五四」以來，中國人深刻認識新的人民生活，必須有新的技術（科學），與新工具（機械）來創造，而妨礙中國普遍迅速採用新技術與新工具的，就是日本少數野心軍閥。因此新文化運動，新生活運動，與抗戰建國事業，是現代中國青年不可分的任務。蔣委員長創立三民主義青年團，就是號召全國青年，共同擔負此種大任。

四、中華文化與革命

中華文化，自古以來，就注重將自然法則與人事法則打成一片，融會而貫通之。在中國古書上，「天」固然有時指倉冥的天，然而在「天」與「人」對舉的時候，「天」即指自然法則，而「人」即指人事法則。所以「將自然法則與人事法則融會貫通起來」一句話；中國學術上用「天人通」三字的成語表之。「天人通」是中華文化要點，所以治學的最高標準是「窮究天人」；治事的最高標準是

『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與天地參』就是『天』『地』『人』三者的協同體。古書中有時將『天』與『人』對舉，有時將『天』『地』『人』三者並舉。在三者並舉的時候，『人』是指人力或人事法則；『地』是指物力或物質世界的法則；『天』則是指一種更高的宇宙大法，揣其意味，則當指一種統括人事與物質的原理。單說『天』與『人』即是將『地』所包括的物質法則，容納在『天』所指的宇宙大法以內。

中國自古以農立國，農民所依以生存是農作物。農作物的生長，是因天時與地宜的適合。『地』和地上所生長的及地中所蘊蓄的，都是可捉模的物質，所以用『地』代表物質。天不可捉模，而運行有定則，所以用『天』代表一種不可見的自然法則。『天』雖然不可捉模，而其運行的法則最易覺察的，莫過於『光』與『暗』，物質性質最易覺察的，是『堅硬』與『軟柔』，人事方面最容易感覺的，是『人』與『我』。所以易說卦傳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

：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人）與義（我）。』

古人就人事上與物質界，看見許多循環不息生滅的現象，推究其起源而不得，祇知道春天到了，植物就萌芽生長，蟲鳥也卵化生育，到了秋冬，許多植物與動物，都有死滅的情形，所以『天』為生命發生的原因。然而也需要土地，然後動植物，纔有所托，而且需要土地的溫度適宜，植物纔能長大，所以天地的協同，是生命所必需的條件。在人事上，則父母是生命的起源。以『天地』比『父母』，是最原始的『天人通』的理解。以後逐漸發展，『天』有寒暑四季，『地』有高下燥濕，『人』有男女美惡，互相配合以求其通，於是發生了較高級的文化思想。在理論上，有先秦諸子的許多『天人相與』的學說，最重要的一部，闡明此原理的書就是易。在人事上，將此種原理充分運用的就是禮。而周官更以『天地春夏秋冬』定政府的官制。而且現在研究中國哲學思想的，總不能拋棄易（包括經傳及各家易說而言），研究中國社會思想及他種智識的，也離不了禮（包

括三禮及各家對於禮的學說）易從天道（自然法則）出發，以陰陽變化為根本，就『天人通』的道理，極力發揮發明了『生』的原則。禮從人道（人事法則）出發，以仁義禮樂為根本，就『天地通』的道理，力加闡揚，發明了『和』的原則。如何能生？是需要異性交感。如何能和？是需要彼此合理。

由易理與五行說（八卦與五行當為中國自然哲學的學生理論）加以特重天道的老莊學，逕向自然法則方面用功夫，就成了後來的道家。由禮樂人事方面致力的就是儒家。想將冷酷的自然法則，用到政治方面的，就是法家。以人事為主體，而求充分運用自然的，是墨家。後來企圖調和自然法則與人事法則，而求運用圓活的，是董仲舒及許慎一般人。想用法家所稱道的『參驗稽決』方法，以推求自然與人事的真象，并審查學說真偽的，是王充一流人。以『參驗稽決』方法考古的，是清代樸學大師。參加印度佛學思想，而企圖融會天道與人道的，是閻，邵康節一派理學家。總而言之，中國的學術思想，總是在『天』與『

係中做工夫。

天道（自然法則）由正與反二者關係發生。人事由內與外（包括『己與他』及『人與物』而說）的關係而發展。正與反永遠對立，就是扞格不和。因此在易經一書中，『天在上，地在下』，則爲否，因爲各不變化，不能生物。『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則爲泰，因其能變化而生物。『互敬而交讓，節用而愛物』，則爲禮，因其能和。『姿欲以相爭，靡費而殘物』，則是非禮，因其不和之故。因爲變化、交感、和合，就能產生新的良好現象、事物、或關係。所以在易傳上『日新』稱作『盛德』。而禮記中主要篇章的大學盛稱『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又方陳『作新民』因爲中國古代哲學的易和文化思想的禮極力讚美『日新』，所以產生了中國的革命說。

『革命』一語，原出於易革卦象詞（象，古蠱字，也就是鬪字，解析之意）『革』，原指鳥獸皮毛，帝典說：『……仲夏……鳥獸希革，』就是說鳥獸於五

月換去冬季的絨毛，鳥獸皮毛每年脫換，所以有除舊布新的意思。革卦取象於澤中有火。古人火耨，每年火焚蕪穢雜草，以便五穀生長。去惡草育佳苗，情形與鳥獸脫舊毛，生新毛相似。所以澤中有火的卦，而以「革」作卦名。全卦彖詞，皆說皮革與換毛事，而引申之，於人事上的變換、革命也稱鼎革。鼎卦取象於以木取火，意在烹飪，所以用烹飪器的鼎作卦名。以鼎烹物，能變化物味，也可以表示變化，所以鼎革可連作一名詞。鳥獸的革，年年換毛，易傳說：「革，去故也。」是表示革的特性。以鼎烹飪，需用薪火，易傳說：「鼎，取新也。」固可說取滋味新鮮，也可以說取新，即是取薪。因為「新」是「薪」的古字，以伐取的草木生火，可以焚蕪穢，去腥臭，育新苗，得新味，所以原為燃料的「新」，也可以表新舊的「新」。「鼎，取新也」頗有雙關語的意味。

革卦彖詞說：「革而信（伸）之，文明以說（悅），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與晦通，表不吉意）乃亡（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革之時義大矣哉！』鼎卦的象詞說：『聖人亨，以亨上帝，大亨以養聖賢，巽（撰，選饌的本字，從共，即掛把表採取）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鼎中有食物）而應乎剛（鼎質堅），是以元亨。』因為革是脫舊毛而換新毛的變化，所以文彩鮮明悅目；毛換得好，所以舊毛的晦闇無光的情形就沒有了。引申起來，則天地變化而有四時，湯武能變化當時局勢，更新其命運或任務，是因為合乎自然的要求與人事的必要。二卦象詞都說大亨，或元亨。『亨』字意義由鼎卦象詞表示得最明白。『亨』就是烹的古字，由火氣上達於食器得形，所以說：『聖人亨（烹飪）以亨上帝。大亨（大烹）以養聖賢。巽（即古『饌』字，論語『有酒食先生饌』。饌，就是取而食之）而耳目聰明（吃了就有精神）。』烹飪是古人的樂事。由指烹飪的亨，轉而為亨通或安順意的亨，正如羊之轉為吉祥之祥，原而鷄的佳，轉而為作佳好之佳。古代認鼎革的作用，都是很通順的，所以說大亨。如近人說極妥。

中國古代說『天地』或『天』正如同英語的 Nature, (自然)。『天地之大德曰生，『而 Nature, 也由希拉文『生』字衍化而出。中國由天道發見了變化法則，并產生了革命說；歐洲也由自然科學發明了進化論，革命也以自然科學為根據。中國『窮究天人』發生了易與禮；歐洲也就自然法則與人事法則發展了辯證法或討論法。

中國因為礦物的分佈狀況不便於開發，不便於利用發展物質科學，以致人事上雖然有很好的理想，關於器物製作，也有靈妙的想像，而終於不能實現。即如道家以窮研天道為最大目的，然也止於修煉鉛汞，注意吐納服食，如莊子所說『吹噓呼吸，吐故納新能經申（伸）術為壽而已矣。此道（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之所好也。』縱然他們避居山林，務求寂靜專一，想明白天道，修煉法術，終限於物質不能成就，徒然在自然法則上糾纏於陰陽八卦五行之中，在利用自然方面留下許多超人力而非超自然的幻想。這種物質的限制，可以說是中國

天賦的命數，然而現在此種命數，也不難由近代人類智慧所發展的科學技術克服之。這正是中國革命的一個重要使命，也就是建國的一個必然任務。如果外力妨害中國努力採用科學技術來克服這個困難，中國自然非竭力抗拒不可，這就是此次對日抗戰的根本意義。

現在中國文化與外來文化，親密的接觸着，發生了鼎革的現象。現在中國青年就是生活在這種鼎革環境中，羣治一天天衍化，『世法輪轉』。中外文化，各有新舊，即各有應來應取之點。各種文化既如五味雜陳，而各有其合宜本味。如何採用恰如其分，正當極力考求。而最重要之點，是不論除舊布新，或調和五味，均要自我主宰，權自我操，以求適合中華民族的需要，即是採擇外來文化，須以中華文化作主體，所以說現代中國青年革命，應當先明瞭中華文化。

五、中國青年對於中國文化之認識

1. 社會的人道主義

中國有四千多年的歷史，現在我們還可以看見三千多年前我們祖先的筆跡。我們中華民族積了四千多年的人事經驗與文化寶藏，所以是極其光榮的。現代中國青年，要擔負建設新中國的大任，必需認識中國的文化傳統。

三千年前，中國人對於宇宙與人類的認識，即是「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所以敬天地，同時也貴「人」，並且將「人」尊重到「參天地，育萬物」的地位。因此在中國古書上隨時可以看到「天、地、人」的說法。這是中國文化最根本的觀念。惟其如此，中華文化第一特點是「愛人」。「愛人」是人對人的情感作用，由兩個人中間開始，古代的話叫做「仁」，即從二，從人。「仁」，愛也，又合稱「仁愛」。仁愛的步驟，從一個人的兒童時代說起，最先是發生於兒女中間。父母對於兒女的愛，叫作慈。「慈」與孳生的「孳」同源，是表明「生生之德」。因為天時地宜的自然關係，萬物得以存在，并孳生於天地之間，所以說「惟天地萬物父

母」。兒女對於父母的愛，叫作孝。「孝」字古文從爻，「效」字也從爻（見易經注）。

所以說文釋「孝」字，說是「放也」。「放」就是說「做效」的意思，原來的意義，是說兒女應學父母慈愛的榜樣，所以古文「教」字同「學」字都從孝，因為使人做效是「教」，自己去做效是「學」。其次兒童中間相互的愛，叫作「友」。「友」字古文象兩隻右手齊出形，表相互的意思。後來長對幼特別需要盡扶助之責，所以專稱兄對弟之愛，爲「友」。幼對長，因為受長者扶助，所以應當尊敬，又特表弟對兄的愛曰「敬」，又叫「弟」。到了後來，年齡長大了就有夫婦的愛情，這應爲「仁」的本義所從出。詩經上屢屢看見「美且仁」的說法，而且全文的意思，都是說：「美好而且可愛。」儒家因爲「正名」的關係，又將夫對妻的愛叫作「義」。「義」是指公共的好處，是克己、是正己，與「利」專指個人的好處相對待。能克己、正己、爲大眾的好處着想，纔能相宜，纔能合作。妻對夫的愛，叫作「順」。說文：「順，理也。」就是說要有道理。父慈子孝，兄友弟敬（或恭），夫義婦順，是儒家「正名」的

說法。簡單的說，實在就是人與人之間，都應相愛，而且是『愛人者人恆愛之』。

儒家的『正名』，是說一個人要名實相符，你叫作甚麼，你就應當盡其甚麼天職；所以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說，『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又說：『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而且人與人間的關係，總是相互的，所以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論語將兩個人的話一并記載，就是因爲正反兩面都能說得明白。論語這段話，還算含混，最痛切的是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因爲這二種德行，都是相互的，所以不含勉強壓迫的意味。

『仁』就是『愛』，是人類一種天性，所以說『仁，內也。』『仁，人也。』『仁愛最

切近的表現，是在父、母、子、女、兄、弟之間，所以慈、孝、友、弟，是中華民族的根本道德。推而廣之，則『孝者，所以事君（一國最高領袖的意思）也。弟者，所以事長（小社會團體領袖或上級人員的意思）也。慈者，所以使衆（羣衆）也』。

『仁』的推廣，可由『人相偶』（兩人和合的關係）的仁，到『無不愛』義的推廣，可由『宜爾室家』，到『無不宜』。所以將仁義推廣，就是家齊然後國治的道理。又說：『刑（型，取法的意思）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這是一種推廣。再一種，就是大司徒教國子的六行。『孝、友、睦、婣、任、卹』即是『愛父母、愛兄弟、愛族人、愛親戚、愛朋友、愛社會。』由年齡方面說：孝是愛長輩，友是愛同輩，慈是愛後輩，——這是孔子一生的志願，即是所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一個人能做到這樣，對於人類社會，可謂毫無遺憾，這就盡了『人』的責任，也就盡了『仁』的能事。上面有老者與長輩，下面有幼年，所以孔子

的志願，也正是青年人的志願。我們要孝，正是要做效這種志願；我們要學，也是實行這種志願。再將仁愛推廣，就是「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以「愛人」與「愛物」，都屬於「仁」的範圍。

2. 行爲的理智主義

「智」古文卽「知」字，象矢貫物形，意爲貫通。說文：「知，詞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詞與「辭」意思相通，同是通達意。顏淵問知，子曰：「知人。」書經說：「知人則哲。」哲「同」知，說文二字互訓。「哲」字原意，是分別剖折。

知分兩方面：第一就是上面所說的「知人」；第二是「知物」。

「知物」就是大學的「格物」。「格」字，玉篇解作量。「格」字從各與木。「各」是分異的意思，古人器具多以木作，故玉篇如此解釋。說文解「格」字爲木長貌，木長則分枝，亦含分別的意思。又，說文：「各，異辭也，從口從文。」其實「各」字當從文與口（古圍字）。「口」，表境界的意思；「文」，表向口前進；與「章」字表二

者取反對方向，離「口」而去表達背意，爲正相反的對照。「各」字就是說異人異物，來止於境上，如古語：「有苗來格」。「神之格思」。因此「各」字是表示分別和限度。故「格物」就是分解事物，以求明瞭。所以大學引用「切、磋、琢、磨、」和「聽訟」，來說明剖析事物（即格物）以求知（即致知）。何以要「知」？因爲「知」所以明「仁」。不明白何以「仁」，就不會行「知」，所以孔子說：「未知焉得仁」。「知、仁、勇」三達德，而知居首；國子教育的「知、仁、聖、義、中、和、」也是知列第一；甚至兵法說：「將者、知、仁、信、勇、嚴也。」知也在最先。論語第一句說：「學而時習之」；荀子以勸學爲第一篇，而開始便說：「學不可以已」；都是教人注重「知」。董仲舒解釋「仁、義、知、」却有獨到的地方，他說：「莫近於仁，莫急於智。……仁而不智，則愛而不別也；智而不仁，則知而不爲也。故仁者所以愛人類也，知者所以除其害也。……何謂智？先言而後當（中），凡人欲、舍、行、爲，皆以其知。先觀（觀察）而後爲之。其觀是者，其所爲得，其所事當，其

行遂，其名榮，其身故利而無患，福及子孫，德加萬民，湯武是也。其觀非者，其所爲不得，其所爲不當，其行不遂，其名辱，害及其身，絕世無復殘類，滅宗亡國是也。故曰：莫急於智。智者見禍福遠，具知利害，蚤物動而知其化，事興而知其歸，見始而知其終，言之而無敢譁；立之而不可廢，取之而不可舍，前後不相物，終始有類，思之而有復，及之而不可厭其言寡而足，約而喻，簡而達，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損。其動中倫，其言當務，如是者謂之智。」所以「格物致和」最合於科學精神，是大學首要的條目，亦是「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

「智」之重要在於明仁，也在於「知恥」。孔子說：「仁者必有勇」。又說：「知恥近乎勇。」「恥」字從止與耳。古時俘虜，或戰敗民族，多被割耳，叫作「刵」或「馘」。「止」卽「趾」字，象脚形。古時俘虜亦多割脚，叫作「刵」；所以晏子時代，齊國踊貴履賤，是說明割了脚的人多。故「恥」字，標止耳

表羞惡。說文「恥」與「辱」互訓。「辱」即「耨」字，古時以屨耕耘，屨是農具，「寸」即古「肘」字，凡有待於以手行事的字，多從寸，與才（手）同意。「辱」是象手執農具。古俘虜或戰敗民族，多降爲農奴，所以「辱」字，也表羞惡。刑與刑，或以爲是對罪人的刑罰，其實古代所謂罪人，也就是俘虜或逃亡被擒的俘虜或奴隸。「罪」字從网與非（古飛字），所以罪人正是俘虜或逃亡的奴隸。凡此種人割了耳朵，以便認識，斷了腳，是免得逃亡，目的是要他們永遠「受辱」作農奴。至同族的人犯了大錯也祇有殺，不受刑，也不受辱，所以說：「刑不上大夫」。又說：「士可殺不可辱」。所以明白了恥辱的意，自然就不願投降作俘虜，自然能盡力奮鬥，與其投降不如戰死。禮記說：「道、德、仁、義，非禮不成。」（「禮，理」與「法」與「禮」是一類同義字）。道，是方法的意思。德是性能的意思（中國古書，道德合稱或連稱，若不另加不好的形容詞，則道德都是就好的方面說）。禮，是明作事的細則。禮記這句話應解爲「若沒有作事的法則，則甚麼好

辦法，好性能，無論愛人與正己，都不能實現。」所以周禮，儀禮，和禮記的一大部份（中間有一部份說原則的），都是一些詳細的規定與記載，條理井然，以使人去做行。說文：「禮，履也，理也。」就是這個緣故。

中國儀禮周禮、禮記叫作三禮，三禮中間不僅吉、凶、軍、賓、嘉、婚、喪、祭、鄉、相見、婦女職務、學生規則等等都有詳細的規定；就是中央政治制度、地方政治制度、市政、鄉政、警政、社會事業、衛生事業、慈善工作、教育工作、經濟事項、信仰設施、軍事、民政、司法、選舉、考試等等皆規定精詳。而大學、中庸、禮運、學記、樂記等篇，說原理原則的，也極其精彩。此種古籍，由二千年前一直到現在，甚至到將來，還可以作為中華民族的精神糧食，並且有許多地方，實在可以貢獻到全人類，為人類社會的最高文化產品。

因為「禮」是一稱行為或工作的法則，所說務求詳密，所以考工記，和月令，那樣專門說工業製造與歲時（略等於農歷）等書，也分別收到周禮和禮記中間。

中國古代的重要書籍，到了戰國末年，大概分爲『經』與『禮』兩部份，（至少荀子個人如此分法。）『經』是取其原理與大綱；『禮』是取其細則。所以荀子說：『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意思就是先通大綱，後精細目。

因爲『禮』主旨在指示行爲細則，條理社會，使之有安定的秩序。社會生活第一要人和，所以說：『禮之用，和爲貴。』因爲要『和』，所以『禮』的主要精神是『讓』。因此『禮讓』常聯爲一詞。然而在社會生活中，有時也需要說爭，所以古禮中間，以鄉飲酒禮教讓，同時又以射禮與投壺等教爭。

社會生活時常變化，細則也不能不時爲變化，所以『禮』，時爲大時，是說因時損益，所以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社會生活，譬如自古至今一條大洪流，隨時隨地有變化，故入事細則，貴於因時制宜，與因地制宜。禮義（宜也）常可聯

稱，就是爲此。但雖有隨時隨地的變化，却不能斬釘截鐵的中斷，所以行爲法則，貴有所『因』，而隨時隨地『損益』之以求其宜。古人說：『事相因則易成；俗相因則民不驚。』又說：『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又說：『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所謂『因』，雖是一部份因襲古代，然而亦要『因人情而作法，順人情而作禮』，『因勢利導』『因地制宜』『因時變法』。

荀子說：『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因爲禮是『法之大分』，所以禮法常並稱。因『禮』是羣類的綱紀，所以又與『理』同義。荀子注重『禮』而兼言『法』，他的學生李斯，就是個大法家。因爲禮、法、理、相通，所以荀子和別的法家一樣，却具有一種『參驗穩決』、『正名明法』的嚴肅科學態度。

3. 宇宙的辯證說

中國古代教育最重是『禮、樂、射、御、書、數』的六藝，後世又用『易、詩、書、禮、樂、春秋。』其實是相通的。前面已經說過，周禮包含『軍』部份，而

現在所知，射有射禮，而周禮大司徒教士以車甲，考工記詳述車法，所以射御應包括在「禮」的範圍內，因此古代的六藝，可混括為「禮、樂、書、數」四項。「禮、樂、書」三項是和後世共同的，而後世的六藝，不見古代的「數」，而有古代所不列的「易、詩、春秋」，初看好像不同，其實在古代詩都可以入樂。譬如詩經裏面的「頌」，就是祭祀時樂舞的「歌」。國風是民間各地的歌曲，雅是民間所常唱的關於時事的歌謠。古代「詩」之可以入「樂」，一直到唐朝還是如此。春秋本是魯史，古時政府裏面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所記的言，如尙書與國語，所記的事，就成了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類的典籍。所以「書」與「春秋」，都是史實，不過「春秋」加上了孔子的「正名」觀。孔子將當時的「名、言、行、」各加以嚴格的定義，然後指實當時的人物及其行為，使之流傳下來。令人一看，就明白人與事的是非善惡。所以「春秋」這部史書，特別爲人所重，列爲後世六藝之一。以外就祇剩了「易」與「數」的問題，正是本章所要說明的。

「道、法、刑、模、範、方、術、數、」等字，中國古書常通用，大概是一種古今字，或同義的方言。由古今音或方言音的不同，而假借各別的中國字，以表「方法」的意思，所以發生很多紛歧。譬如說法家出於道家，而方士又稱道士、法師、術士；道術，也說方法，也說道法，也說方術；法家亦稱刑名家；刑又稱模、又稱範（箝）；又稱法。（說文）型，鑄器之法也。」段玉裁的註解說：「以木爲之曰模，以竹曰箝，以土曰型。」法術又曰方術，又曰道術，又曰法數；道法又曰術數，常法，常道，又曰常數，又曰常則。以外還有章、程、制、度、規、準、理、律、例、計、途、軌、度、量、等，合計不下幾十個字，都可以作「方法」或「定則」的解釋。

莊子天下篇說：「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上面的六個「道」字，是「導」的古字，意爲說明指示其法則。

陰陽就是「反」與「正」，指相對兩種事物。易以道陰陽，是說：「易經是說明

指反與正的法則」。『易』以道陰陽，本是說明『天道』，即是說明『自然法則』。所以卦傳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必須有兩個不同的事物相對，然後可以發生動作，表明動作；有動作纔會發生新現象，產生新事物，發生新變化。所以說：『生生之謂易。』易經主要的就是說明這個變化的道理。『陰陽變化』是自然界的總法則，內分物質間的變化（地道），及人事上的變化（人道）。所以說卦傳說：『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舉剛柔以代表其他物性，說明各種物質變動的法則。）立仁之道曰仁與義。（董仲舒說：『愛在人謂之仁，宜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人道是說明人與己相對的法則。』

陰陽古文作𩇛易。說文：『𩇛、雲覆日也』；『𩇛』字構造表雲霧集合，所以說文又說：『陰，闇也。』『易』字從旦，從勿，表其光鉞，卽『嗚』的古字，說文：『嗚，日出也。』所以『陽』字說文解爲『高明也。』

黑暗和光明相待，是全人類共同的原始宇宙二元論。然而在二千年前就能將這種初民的原始思想觀，推行到物質與人事二方面而貫通之，造成一種比較嚴密的自然辯證觀，這是中華民族祖先最偉大而獨創的貢獻。

由陰陽二元，衍而爲八卦，傳說是伏羲氏的創作。伏羲氏的年代雖然難考，然而是在三千年前是無問題的。八卦表「天、地、風、山、水、火、雷、澤、」八種自然質素，以統萬彙；現在看來，當然是簡略，然是比古印度與希臘的四元說，已較完備。除八卦以外，大禹謨又有「金、木、水、火、土、穀、」的六府說。以外又有「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說。六府說與五行說誰先誰後，發生在甚麼時候，我們還不明白。然而「八卦」「六府」「五行」都是前三千年左右中華民族祖先研究自然界的幾種偉大企圖。雖然因環境物質與工具所限，這種企圖沒有很快的發展爲近代的精密科學研究，然而知道「五行無常勝，說在宜物盡」的墨子，確實有些科學與制作的貢獻，則是信而有徵的。而且混合「陰

陽說」「八卦說」「五行說」，秦漢以後諸道家與方士，也於中國的初期科學工藝有些貢獻，卽如爲化學始祖之煉丹術上的發明，中國就較西方爲早；道家所注意的「服食、導引、長生、久視」之術，也於中國古代的醫藥術，衛生方面，有重大的貢獻。由陰陽八卦相互相成的社會辯證觀，發生了儒家的「革命」論，由陰陽五行相生相剋的自然辯證觀，發生了道家初步科學的研究與發明，這決不是偶然的，而是中華民族文化，從遠古以來，長期孕育產生的結果。（并且由這種辯證說產生了中國的神聖觀，詳細的述說見於先秦諸子書中。）

4. 信善誠一的宗教信仰觀

孟子說：「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甚麼是可欲？孟子說：「禮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就這幾句話，已經可以知禮義是孟子所謂可欲的，卽是善的。以外因齊宣王說自己好勇、好貨、好

色，孟子就勸他學文武之大勇，學公劉之好貨，學太王之好色，好勇要做到「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好貨要做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好色要做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好貨與好色能與「百姓同之」，好勇而能「安天下之民」，則都是可欲的，都是善的。甚至齊宣王「欲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那種「大欲」，祇要先能發政施仁，做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也是可欲的，也是善的。所以「仁、義、禮、智」都可欲的，善的。其次孟子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矣。」他舉了很多例來說明這點。既然是固有的，所以是實在可信的，將這個性質充實起來，就是「美」。充實而又發揚之就叫作「偉大」。偉大而又能「窮則變」，以得通達無礙，就叫作「聖」。一般人看不明白就說是「神」。孟子這段說話，恰好可作為中國宗教哲學觀。

因為聖人即是將其固有「仁、義、禮、智、」充實而發揚光大、又能變通盡利的人，所以管子說：「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凡物載而

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專於意，一於心，耳目之端，知證之遠。……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極變所以應物也。極變而不煩，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

荀子也說：聖人是「道出於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又說：「神莫大於化道。……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故君子結於一也。」

漢以後佛學傳到中國，因佛佗是以教人行般若（智慧）成三昧（真知）以度衆生，中國人謂之覺王，意思就是大智者。彌勒是以慈悲爲本，中國人謂之慈王，或仁王，意思就是大仁者。佛法的「無常觀」與「轉輪說」實，與易學相近。「四姓平等」與「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說法，也相當於一切衆生皆有佛性；與「人皆可

以爲堯舜』的性善說亦相類。『佈施』有似於『博施衆濟』。『持戒』有似於『克己復禮爲仁』。『忍辱』近乎『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精進』近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禪定』類似『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又相當於『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結果智慧纔能得到，乃成正覺（即中國所謂聖哲），印度古代講學於深林，披髮入山，意義同如中國束髮受書。『出家』所以推事親之道事人，遊方說法等，亦等於孔孟周遊行道施教。佛教教義，與中國文化，互相發明，而在文學、思想、工藝、美術，教育及醫藥等，又有益于中國。佛學的教育方式，先影響到道家，促成了以唐爲始的道觀制度；第二影響到儒家，促成了宋以後的書院制度，所以佛教入中國竟能與中國固有文化沆瀣一氣。

唐以後，依斯蘭教傳入中國。依斯蘭原意爲性善，後來回紇人信仰的多，俗

稱回教，因以崇拜惟一的上帝，又極重清潔衛生，近於老子所謂『古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的『清』德。又因其信仰崇拜的規律極誠篤；每天須五次禮拜，每次禮拜須先盥浴；每七天要集合舉行禮拜，終身都望實行親朝麥加（聖地）一次，其精神無比，所以又類於莊子所謂『真者，精神之至也，不精不神，不能動人。』的『真』德。因此『清真』寺，就成了伊斯蘭教禮拜寺的中國名稱。回教的每日五次禮拜，意頗同於中國先賢『吾日三省吾身』的意思，且加上說清潔衛生的作用。每週聚衆禮拜，有同於中國『聚宗會族』的作用，而教養的用意更強。關於飲食方面之注意，頗如孔子鄉黨章所說，而且更爲嚴格。『天課』的作用，不外於『睦、婣、任、卹、』用意既深，實踐亦有實際規定，所以大可爲中國人之效法。爲了如此，回教也能與中國文化合流并進。而且回教信徒的曆算家及軍人，也極有功於中國。

基督教原係猶太人融和巴比倫及埃及的文化，就其游牧轉徙的民族生活，與

受外族壓迫摧殘而來的歷史所養成的種種信仰，外加若干希臘思想，及羅馬政教制度，而成歐洲最高文化。其亞洲色彩較濃厚的一支，所謂景教，雖然唐朝就傳到了中國，但宣傳與組織的力量都很弱，於中國文化，沒有多大影響。從明末到清初，天主教湧到中國，纔帶來義大利文藝復興期的許多科學、工藝、與美術，初期的天主教士，頗能深研中國情形，明白兩方面文化，可以互相貫通，所以也能和中國社會相安無事。

因為中國的文化教育的根本精神，是要必仁且知，能和能化，對於外來文物，歷來採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的態度，所以能兼容幷包。中國本身的文化，也并不弱於外來的文化，所以也不帶懷疑警戒的態度。近幾十年來，外國的信仰從多方面源源而來，因挾了現代歐洲國家的勢力作後援，其中雜有若干政治與商業的性質，其態度頗不與以前宗教相同，中國社會受其動盪，尤其青年一輩感覺不安。但其根本精神與理想，與中國有共同之點，且各有其

特長。不過其信徒的生活態度 and 方式，因其從來的民族歷史與社會環境不能與中國全同，所以到中國的時候，遠者將百年，近者也將二三十年，仍然不能和中國社會打成一片。但是一二年來因環境的需要，一切信仰均已漸能融和無間，共同為中華民族生存努力，這可算是中華文化史上，應該大筆直書的。我們欣幸時代的偉大，而尤其崇敬我們民族導師 蔣委員長 的偉大。我們在最高領袖領導之下與偉大的時代之前，現代中國青年，實在要小心謹慎，去研究外來的文化，并需困心衡慮，努力了解尊重自己的文化。我們固然不能妄自尊大，目空一切，也不能詘己崇人，隨人俯仰。青年人有前進向上，『日新其德』等美德，所以常常愛高而鄙卑，喜遠而忽近，好新而輕故，然而中華民族積三四千年的經驗，却承認：

『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

『爲山必因邱陵，爲海必因川澤。』

『篤近而舉遠』；『溫故而知新。』

東漢王充，最富於疑古精神與科學態度，他說：「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

近代中國青年，自應深切體會以上所引的古訓。

六、中國青年之任務

我們青年既然明白了本身的地位，又明白了中國的文化，就要負起先知先覺的任務，發揮中華民族數千年來所教訓的「智仁勇」的精神以盡「立己立人」的責任。這種責任可由下述三項工作完成之。

1. 知的工作

孫中山先生分人為「聖、賢、智、庸、愚、劣」六級。集大成而無所不通的稱爲聖人。精通一藝的稱爲賢人。在較高水準上常識豐富的可稱爲智者。僅能有日常生活認識的是庸人。不能上進的是愚人。趨於下流的是劣等人。

孔子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矣，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也。』又說：『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以孔子的話對照孫中山先的話，則上智是聖與賢；中人是智與庸；下愚是愚與劣。上智與下愚都是特殊環境所養成，難於施人力；智庸正是中等的普通人，佔人類中的大多數。

現在我們要求中國的自由平等，我們就要利用我們中人以上天資，努力向上。第一要在知識上征服自然，『制天命而用之』，以除自然界給與中華民族的縛束；第二要從知識方面努力研究，設法解除外來人為的縛束；第三要從知識上造成一個高度的文化環境，以便產生聖賢，而本身也可以努力勉為全賢，使在自然的水平線上與各民族求最高度的平等。

中國的科學精神與方法，都發達得很早，譬如中國第一個於科學上有貢獻的墨子，就有說是生於孔子時代（紀元前五五一——四七九）則較之歐洲奉為科學鼻祖的亞里斯多德的時代（紀元前三八四——三二二）總要早到百年左右。又有

說墨子是在孔子之後，則考察起來：孟子是生於紀元前三七一年，而卒時在紀元前三一四年以後；查孟子書中則當時墨學已大流行，與儒揚鼎立而三；而墨子書中沒有一句話提到孟子，所以墨子至少應不後於孟子時代，而應在其稍前。根據後一說則墨子至少是與亞里斯多德同時代的人物。

因為中國的科學發生最早，所以製造方面也就大有貢獻於世界。至今歐洲人亦承認羅盤針、造紙術、印刷術、火藥、煉丹術、重拱橋樑等為中國所最先發明。絲織品也是中國對於世界的貢獻。但這些都是手工業產品，是由民族生活經驗積漸產生的，不是由科學研究而來的機械的產品。

講到科學研究，中華民族也是世界優秀民族之一，科學的精神和方法，就早已完備。為近代物質科學的機械工業之父母的鍊鋼、冶鐵術與煤層等，中國亦發現利用得很早。禹貢上有鏤（即銅）的記載，戰國時鐵的利用已經很繁盛，漢朝已設有專門的鐵官三十八，這都是公曆紀元前的事。馬可波羅遊中國時，已見中國

北部人用煤炭作燃料，因他不認識就說是契丹人以黑石作燃料。由此可見中國人用煤炭至少開始於十三世紀以前，而當時歐洲人還不知道煤為何物。然而近代科學知識和機械畢竟讓外國人捷足先登的原因，一直到最近由地質學方面的研究，才明白是因為中國的煤鐵分部埋藏狀況，遠不及英格蘭和萊茵區；而中國的地形構造亦使煤與鐵的運輸與集中不便。大禹謨上就曾極力提倡『金、木、水、火、土、穀六府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在上述的物質條件限制之下，為金屬的鐵與生火力的煤炭，就極難和合，從而不能利用五行生剋的作用，而產生新的精巧而龐大的機械工具；也就不能利用牠配合着工業組織來從事研究的工作，以更進一步的發展近代的物質科學。

然而，我們現在上承大學『格、致、正、誠、修、齊、治、平』的教訓，和禹謨『六府之事』的遺訓，已可以遠引歐西科學工業已成的工具，來克服自然環境與我們的縛束。我們應本『仁民愛物』的聖教，充分作『格物致知』，利用『

厚生』的工夫，開發自然資源，發展機械工業與物質科學，以解除外來人爲的縛束，並求與各民族達到自然平等的最高水準。這是現代中國青年，在賢明的政府領袖主持領導之下所應積極努力去做，而且實在可以於較短時間內做得到的。

2. 仁的工作

大聖先賢教我們『明德親民』，又教我們『親仁善隣』，這都是教我們做仁的工作。孫中山先生教我們『喚起民衆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也正是教我們作二千幾百年來聖賢垂示的『親民』與『善隣』工夫。如何可以去做？并且如何做得到這種工作？第一是要『克明俊德』，就是要能發揮中華民族本身的偉大性能，第二，是要使『遠者悅近者來』。要做到第一點就先要『知己』，要做到第二點，就要『知人』。孔子所謂『未知焉得仁』。大學所謂『格致爲治平之本』，正是這個意思。中華民族本身的偉大性能，卽是『仁德』。由知人而親仁就是仁道。

何以如此說法？因為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提倡『貴』人與『愛』人。所以說：『天地之大德曰生』，就推重『有容德乃大』。中國自古注重『孝』，力求『勝殘去殺』，主張『不嗜殺人』。因此中國人口之衆多，自古就有名於世界。晉魏、六朝、隋唐中間西域到中國之後，就有『震旦人多，天竺佛多，大食馬多』的說法。馬可波羅到中國，說到中國人口數量，常以百萬計，當時歐洲人以爲怪談，給他以『百萬君』的渾名，而不知確係事實。所以說中華民族的偉大性能，即是『仁德』，實在是事實得來的結論。至於現在我們還要努力發揮這種『仁德』，即是『明德』和『克明俊德』，也是毫無疑問的。因爲現在我們人口的增加，已經趕不上許多其他民族，非從『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上去加緊努力不可，而且要以學與事並進並重的精神，從『正德、利用、厚生』的應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上，加倍努力，這是第一點。

其次，爲要『知人』，我們非要從許多人文學術（如語文、歷史、宗教、信仰

等）去了解本國各地方與國外各地的人情不可。因為中華民族重『有容之德』『好生之德』及『孝道』的關係，除中國本土已有人口四萬萬五千萬以外，在國外各地與中國有血統關係的人口，積三千多年來中外交通的歲月，總也有二萬萬的數目。這種龐大的人口散佈在亞洲全部，因為地域遼遠，天時、地宜、人事頗有不同，我們不明白這種人口的詳細，而加以深切理解，我們就不能達『親親仁民』的喚起民衆目的。而且我們若沒有很好的『務材，訓農，適商，惠工，敬教，勤學，授方，任能』的辦法，那就是居在國內的人民，我們也不能使其親附，即也無從喚起，國外的人口更不用說了，這是第二點。

再次，是『柔遠能邇』的工夫，即是要『善隣』。爲此，我們同樣也要『知人』，能夠明隣人的虛實情偽，才知道到底可親或不可親，如其可親，應如何親法，如其不可親，應如何力圖補救和自衛。

上述這些『知』與『仁』的工夫，都是爲的明白『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

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方法，以便實行。這些方法便是孟子所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道理。不明白這些方法、便會受「寡助之至，親戚叛之，」的禍；明白這些方法，而好好的實行、才能得到「多助之至，天下順之，」的福。

3. 勇的工作

孔子說：「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又說「知恥近乎勇。」我們現在已經受人侵略，受着「不若人」的待遇，而且事實上我們已顯然知道在「知」與「仁」兩方面，我們都有努力之點。

恥辱的意義、除不若人、應以為恥以外，還有曲禮所說：「地廣而蕪廢不治，此亦士之恥也。」這是說建國工作未做，是成年國民的恥辱。再者，前面還從字義上說明了戰敗投降必受恥辱，即抗戰不勝，是國民的恥辱。我們既明白這種恥辱，我們就非勇敢的奮鬥不可。

中國近幾十年來，因為自知「不若人」、自知「地廣而蕪廢不治」、也自知「戰

敗民族降爲手工業農業國家，整個民族淪爲農奴』的恥辱，所以我們便起來奮鬥。四千多年來對於世界人類有大貢獻的優秀中華民族，到了『不若人』的地位，受了『不若人』的待遇，不僅是不平等，而且對於世界人類決無好處。這不僅是不自然（即不合天道），且不近人情（不合人道），這種局面，非大加改正不可。所以孫中山先生發起應天順人的國民革命，來打不平。打不平是義舉，將四萬萬五千萬人從農奴的恥辱中救出來，更是義軍，也是仁道。洗淨全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恥辱，謀全人類的福利，正是實行四千五百年來、成仁取義的聖賢之教『見義不爲，無勇也。』所以中國國民是應天順人的偉大義軍。我們『行己有恥』，要完成這個義軍的任務，祇有發揮『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的大勇，來實行抗戰建國。

我們的領袖，對於戰爭，省察了好幾年，真也盡了『困於心衡於事』的能事，而且已經做到『民與上同意』。所以全國都奉行三民主義，明白我們實行革命的抗戰，顯然我直敵曲，我仁敵暴，我是敵非，我義敵鄙，正是合乎『自反而縮

（直也），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養勇之道，也養成了「仁者無敵」的信念。我們有知、仁、信、勇、嚴、全備的最高領袖，在幾年中間已經盡知「用兵之害」，做到了「代謀代交」工作。這幾年來，實行新生活運動，提倡中國固有美德，真是做到「道以德，齊以禮」，使人「有恥且格」了。

自軍興以來，我們最高統帥部已完全達到了「上下同欲」的目的，採用「致人而不致於人」的戰略，實行「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使敵人陷於「可以往難以返」的情形，已經先奪其所愛的「速戰速決」的目的，使之居於「致於人」的地位。往後我們自然更要加緊「知己知彼」的工作，一方面「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一方面也要達到「屈人之兵而非戰」的目的。我們必定要做到「有勇知方」，要明白，孫子所說：「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我們必定要做到孫子所說：「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同時也要記住管子所說：『爲兵之道，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能設這樣，庶勇的工作可盡，而中國青年對於抗戰的任務才得完成。

七 中國青年之奮鬥——捍衛和平

1. 和平爲中華文化的真髓

因爲中華民族的根本道德是仁愛，所以歷來有一個『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社會倫理觀。這種倫理觀，還有一個『惟天地萬物父母』的宇宙觀作基礎。由『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倫理觀，自然產生『平等』『博愛』『互助』等美德。

西方所稱『博愛』其字義原來就是『兄弟之道』，中國以『友』字表示之。『友』字從二右手相合得形，意思就是說互助或合作。現在引兩章二千五百年前的詩來說

明古人對於『兄弟之道』的熱慕。

一 常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感，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蒸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饋爾盞豆，飲食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翁翁。和樂且湛。

二 伐木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水；嚶其雷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聲，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所以孟子以『仁政必自經界始』的道理告滕文公，其用意在作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由仁愛的根本道德所產生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友助，親睦的牽助現象，中國人稱爲『人和』。中國歷來極注重這種『人和』，所以常與『天時地利』並稱，而且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

如人和」。

如何獲得『人和』。中國歷來都主張用禮樂之教。所以荀子說：『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爲的是：『禮之用，和爲貴，』樂以道和。』

中國古代所謂『禮樂』，卽近代語所謂『文化』。『禮樂』不僅指近時所謂『行禮與作樂』，孔子已經說過，『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因爲古代有重要事時必行一定的儀文（禮），而舉行儀文時，多用樂，所以『禮樂』常連稱，而禮亦可概括禮樂，所以樂記在禮記之內。要說明『禮樂』之所以卽近代所謂文化，不必多所說明，祇舉出禮運篇就夠了。禮運一篇，主要是說明『大同』與『小康』二種文化形態。兼論文化原理，及其細目；其內容決非簡單的一『行禮』與『作樂』可以包括。禮器一篇，也是文化細目的原理。大學和中庸更是中華文化總綱，這四篇書，都收在禮記裏面，至於周禮則所涉更廣。所以禮記就是文化論文雜纂；而周禮則是文化大全。曲禮是文化瑣述，禮運是說文化的

運動或運用；禮器是說文化的功用。因此孔子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正是說：『殷承繼了夏的文化，其批評的接受痕迹，可以看得出來；周承繼了殷的文化，其批評的接受痕迹，可以看得出來。』孔子又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這是說：『夏與殷的文化我都說得出來，只杞與宋雖是夏和殷的後人，而記載缺乏，不能查攷。如果記載充分，則我也就能夠參考了。』又因周打敗殷之後，殷雖然文化先進，却落於被統治的地位；周雖然文化後進，却居於統治的地位。因此孔子說：『先達於禮樂野人也，後達於禮樂君子也。』孔子是個『集大成』的人，他在文化上也取此等態度，因此他曾說：『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舞韶。』而時曆、馬車、冠冕，正是他所說的夏禮、殷禮、周禮，而『舞則是虞禮』。帽子也說是禮，所以：『麻冕，禮也。』所以『禮樂』有時又單獨稱『禮』，許多地方都應作為『文化』解。文化是逐漸

累積改進的，所以說：『周監（鑑）於二代（夏與殷）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這正可與前面所引『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兩句話相發明。也正是因為『禮時爲大』罷了。至於『禮失而求諸野，樂失而求諸夷』兩句話，更可說明近七十年來中國文化的動態。禮器說：『禮合於天時，載於地財，順於鬼神（民族信仰），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禮運也說：『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中國古書常常用『天』字以表歷史法則，或自然法則，常用『地』字以指物質條件，或地理環境，以『鬼神祭祀』表當時的信仰制度。所以有以上二種文化理論。其實簡單說，禮（文化）要合宜，『義者宜也』，所以禮義，又常并爲一詞。

從語源學上研究，則中國的『禮樂』相當於歐語的『固而篤』，而不同於『虛僞軋轢性』。因為『固而篤』兼祭祀與教養二義，與『禮樂』正同。而『虛僞軋轢性』的意思，祇是『市風』或『城市化』，意義既狹，而且與禮樂涵義不同。

我們明白了現代語彙中的「文化」，在古語是「禮」或「禮樂」或「禮義」，又已經知道了中國禮樂的作用，都在於「和」，現在再引一段荀子的話來說明「禮義」與「和平」的關係。他說：

「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欲也。然則從人之所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贖也。故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智、愚、賢、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穀祿多少，厚薄之稱，是爲羣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方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器械，士大夫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智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

在政治上則國語說：「夫政衆樂，樂從和，和從平」，因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渝曰平。」又說：「君子平其政。」如何「平其政」？晉語說：

「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懲穢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賢授能，官才定物，正名育類，昭奮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族，友故舊……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

人食力，又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夫如是，則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在晉亂後，晉文公用這種辦法，作到『政平民阜，財用不匱。』正如在狄難的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以至辦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至於『和』在政治上的效用，則管子說：『君以利和』，又說：『爲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

因爲和平的作用這樣重大，所以國子教育中的六德既已舉出『和』，而六藝又首列『禮樂』。在軍事方面，荀子說：『和齊百姓，使民不偷，將帥之事也。』

『國語也說：『師克在和。』在農業方面，國語說：『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

『荀子說：『寒暑和節而五穀時熟』。在技術方面，禹謨說：『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甚至在宗教方面，國語也說：『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在一般經濟與財政方面，荀子說：『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

，而時斟酌焉。」

由禮樂何以能致和平？則正因為中國的禮樂有幾個要素：

第一是仁——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第二是讓——國語說：「夫讓，禮之本也。」孔子說：「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以哂之。」

第三是正名——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正名所以使名實相符，恰如其分。所以名正則分定，分定就可制宜。所以禮運說：「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國語也說：「名以制義，義以出禮。」

第四是節事——禮器：「先王之制禮以節事」。孔子說：「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禮不

踰節」，恰如其分，必當於理，不豐不殺，無道不及。無道不及，正是「中」的道理。所

以中庸是禮記重要的一篇，正如常典，所謂「允執厥中」。

2 中華文化對戰爭的態度

中華民族文化的根本是和平，所以不獎勵戰爭，尤其反對侵略。然因爲反對

侵略，所以不能不從事防禦。中國的國策是防禦，從語源學上也可以看出。「方」字是古文「防」字。「方」字形象人舉手防禦。「方」字在古詩是作「國」字解。周書有多方篇，書序說：「誥庶邦，作多方。」多方的意思，正是庶邦，也就是諸國。詩經說：「以綏四方」，也說：「以綏四國」，又說：「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方」和「國」正是同義字。甲骨文中凡國名都說某方，更可明此點。

如何防禦？中國的學說，是採取「內和外威」的政策。內和的方法，前段大概已經說過，首先是要行「禮樂之教」的意義。第一要國有組織，第二要社會有紀律。關於國家組織，中國古代就以當時羣治狀況為根據，有王制與周官等書，孟子也曾經就這點發表許多意見。關於社會紀律，一方面有管子書，一參其國而伍其鄙」的職業組織法；一方面有孟子的井田說；再一方面有倫常說。或者說「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義、婦順」，或者說「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老仁、臣忠」，又一說「君義、臣行、父慈、

子孝、兄愛、弟敬；』總而言之，是使人各盡其職。所以荀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二也。』能夠確實做，則正名的工夫，已經可以不爭，然而人的天性，還是有時不免好爭鬪，所以另制鄉飲酒禮以教讓，制射禮以教爭。教讓所以養和平的習慣，教爭所以導競勝的天性。

關於射禮，孔子曾說：『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射有似乎君子，矢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也說：『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由此可見中國古代射禮的精神，正和現代競技相類，極重所謂『競技者風度』，和『公道態度』。英國人自稱他們國家的政治道德、乃從競技中養成，又說：『滑鐵廬的戰役，是在意頓學校的球場上戰勝的。』其實中國的射禮，正是注重這點。

此外再加以音樂教育，正如荀子所說：『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宗族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樂教可以養成將帥和睦與士卒和調的武德。

實在，中國『禮樂之教』的注意所在，無非要達到『內和』的目的。『內和』爲甚麼可以外威？其理由荀子說得最明白，因爲『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疆，疆則勝物……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近世集合多人遊行呼號，叫作示威運動，正是表示『內和外威』的意思。

因正名可以定分（職守），可以達到『農農、士士、工工、商商』的目的，就可以作到管子所謂『財蓋天下、工蓋天下、器蓋天下、士蓋天下、教蓋天下、習蓋天下、偏知天下。』并且『明於機數』『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偏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無不）勝矣』。

因『君子之爭』養成於平日遊藝之中，就可以養成下列的美德：一、不嫉能

；二、正己；三、反省；四、恥不若人。這都是軍事上的德性。

由正名的倫常教育，一方面可使人民親上死長，一方面可以民和財豐，所以軍事教育實際上可寓於『禮樂之教』中間。『禮樂之教』是以仁爲根本，因此孟子說：『仁者無敵』。因爲『仁者無敵』所以能做到『止戈爲武』與『不戰而勝』。所以國語也說：『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

復次，所謂『外威』的『威』字，另一解釋，就是爾雅所謂『威者則也。』詩經說：『愷悌君子，四方爲則』。因爲『仁者無敵』所以爲四方所取法。中國古代兵與刑不分。『刑』之原字應當作『型』，立模範以正人，就是刑的原意。因此國語說：『夫戰刑也，刑之過也。』意思就是『戰爭所以糾不正』。而且中國最高的戰爭理論是『征』。『征』字從『正』得意，恰好可以表達『兵刑不分』，與『戰刑也』的本意。中國的政治理想也是說：『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詩經說：『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都是說：先在國內作一個和平的

榜樣，以供別國倣效。如果有好亂的國家，怙惡不改，然後以兵力去糾正，這就是孟子所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叛，有不戰，戰必勝矣。」孟子所謂「道」，正是中華民族四五千年文化正統的仁道，因為能仁愛，纔能得多助，所以中國古代政治家的名言（即魯宣公十二年楚子所說的）。是「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

3 中國國防問題

管子說：「地爲政本」，「理國之道，地德爲首」，中國立國以來，因為地理的關係，決定了中國四五千年來的國策。因為中國古代重心在北方，而亞洲北部草原，是古代游牧民族東西往來孔道的邊沿，最易受人侵略。由蒙古的東部起，向西北經西伯利亞，中央亞細亞，以至波羅的海，是一條大孔道。所以發源於亞洲的勞蘭人，及以後的北匈奴，後來的匈牙利人，都由這條路向西走。另一路由

蒙古一直向西，經高加索到地中海，突厥人就是由這條路去的。上述兩大民族之所以往西方去，是因為中國內部和平統一，能夠發揮最大的建設力量，也因古代中華民族的祖先，是定居在游牧民族東西通路的邊沿，所以自古就有一貫的國防思想。由常典的『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已穆，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到大學的『格、致、正、誠、修、齊、治、平，』都是『內和外威』的國防最高原則。有確實的記載可考，最先發揮『內和外威』精神而實踐的是管仲。因為他能夠『作內政，寄軍令，』而且『官山府海』、『參國伍鄙』以治內，同時能夠『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作到『一匡天下』，將當時的中原統一起來，定了葵丘之會的『和內』公約。所以管仲能相齊國，外拒侵略勢力，以安諸夏，使二百年後的孔子猶稱道受其之賜。（管子一書縱然不是他自己作的，也是戰國時代的人思念管仲的功德，體會他的意思寫的。管子全書的主要意思，是『和內威外』，正合管仲一生行事的宗旨。）

孔子一方面讚美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又主張用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的方法，明恥教戰。墨子一方面主張『尚同』以齊一天下之義，一方面也力治守具。趙國一方面築長城，一方面變法易俗，習胡服騎射。孟子一方面主張行仁政，以不嗜殺人的仁術一天下，一方面說：『鑿斯池也，築斯城也，效死勿去。』荀子極力宣傳『羣居和一』之道，一方面說：『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又說『政刑平，百姓和，則兵勁城固，敵國將自屈。』……『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用兵之要，在乎善附民而已矣。』這都是中國一貫的國防思想。因此由戰國以至明代的萬里長城工事，是中華民族爲求羣居和一，用了將近二千年所作的國防工事。由此工作將古代的許多小國凝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人多地廣、世界無比的大國。長城的作用，一方面在防禦外來侵略，一方面在保育中國文化，同時也使西北外來人民，一入長城，便有一種安全感覺。

受着中國文化的陶冶，過一種文化生活，同化於長城內的中華文化共同體以內。自從秦始皇用李斯的酷烈手段，從政治上與文化上統一中國，及漢武帝用董仲舒尊儒術，誅百家，都不過想由『齊一天下之義』，辦到『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以禦匈奴。』但秦始皇的方法，釀成了六國遺民的反動，漢武帝的政策，也助長了王莽的趨於極端，和往後民間道家思想的暴動。中國一和內，最成功的，惟有最近 蔣委員長在兩年來所完成的局面。

然而在這二千多年中間，如果以前沒有管仲創造的霸局，及以後的秦漢唐宋明各代全國一統，以整個民族力量，從事長城建築，則西北方游牧民族必然如春秋前半期、與六朝、五代、元、清時期一樣，霸佔中國，必不會到西方去。高盧法郎克人、日耳曼人，恐怕不會定居在現在西歐的地方，盎格羅薩克遜民族也許不至於過白海到英格蘭；加馬等或不至於作非洲迴航，哥倫布也許不至於發現美洲。而中原民族，不僅如晉宋二次南渡及明王之逋逃南洋諸島，也許要受到更

嚴重的迫害，全世界文化史，決不是像現在這樣了。

因為中國二千五百年來，不斷的在外來威脅之下，固定了內部大一統的思想，同時陶融了隋唐以前一千多年的「文武不分途」的教育方針，「軍民不分治」的政治策略，以及「農戰」的國防大計。因為如此，所以中國歷來有「重本輕末」的經濟政策，有「強幹弱枝」的政治組織，有「禁私鬥」與「孝弟力田」的社會教養，及「聚宗會族」的基本社會組織。

由大禹謨的「正德、利用、厚生」到大學「格物致知」的教訓，不能發展中國物質科學；由管仲的「官山府海」到漢代的「鹽鐵」政策，以及後來道家的「丹術」不能發展中國的化學工業與農業，這決不是因為中華民族頭腦遲鈍，正是可以說明中國地質上的情況，束縛了中國，使之久不能達到近代科學動力機械的階段，以利民生與國防。而且中原的天時地宜，對於畜牧，或者也有妨礙，所以中國從遠古以來重射御，講牧政，而為原始工作的動力，及軍事機械力的馬匹都仰

給於西北。

甚至於中國的銅礦分佈，也不見得好。現在發現的先秦鼎彝，并不重大，然而在當時已經是宗廟重器。照禹貢上看，「金三品」是荆揚二州之貢，直到秦始皇統一六國，收天下兵器，也祇鑄成銅人十二。漢朝鄧通致富，也是靠四川的銅山。以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形看來，可見利用金屬原不容易，這樣便限制了中國工藝的發展。

因為在古代中國，金屬這樣難得，就影響到中國的一切。軍事上自然受影響，就是造船術也受了限制。並且中國古代森林分佈狀況，或者也不見得如何良好，禹貢上祇有荆揚二州的木材較好，齊國雖早有實行「官山府海」的政策，然而孟子時代還有「工師得大木則王喜」的情形，可見大木并非易得。詩經說：「大路南金」又說：「南有喬木」也可以證明金與水都以南方為好，北部的中原不易得到。詩經「馴鐵」等章，是說秦風。「冀北之野多良馬」是晉國名卿魏絳的話，

可證中原的馬又少又不好。

中國自古以來的重要產業是甚麼？自然不外是農桑。因此從古以來的對外貿易品是絲茶兩項。從漢朝以絲綢見稱於西方起，一直到前二十多年，還是以絲茶爲出口最大宗。即說近代中國所有的外來科學知識，與動力機械全部都是由絲茶換來，也不爲過。中國的天時地理，決定了中國的人生，也決定了中國的國策，同時決定了中國的國防大計。所謂『天地人』三才的學說，實在是中華文化的異彩。

中國古代既因爲天惠地宜的限制，不能在人生日用方面充分利用木材金屬及馬匹；也就不能在軍事上建立強大的艦隊，裝備堅甲利兵，及組織縱橫掃蕩的騎兵。然而中國有的是高山大川，與廣源的地利，及宜的五穀天惠，因此中國在民生方面，就從農業方面努力，推崇平治水土，獎勵孝弟力田，而且收了很大的功效。南宮适說：『羿善射，夏蕩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稱讚他說是：『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這真足以表示孔子不勝其歡喜讚歎。

之意。也因此禹和稷都成了中華民族的神聖。而且龍王廟（水神）與土地廟（社稷神）便變成了普遍中國的民間信仰中心。因木料與金屬都不易得，所以工具不易製造；又因為比較便於驅使的動物動力——馬匹不易得，牛也很貴重，所以平治水土，種植五穀，修理道路，最大部分都依靠人力，因此「人」就成了最可寶愛的。

歷來中國雖然在比較困難的天惠與地利中間，然而因盡了最大的人事，居然克服了許多困難，所以就將人的地位抬高到與天地鼎足而三。并且能發明工具，幫助人力，以克服天然和地宜的發明家，都成爲中華民族的聖神。可以說在全世界沒有那一個民族的發明家，有中國這樣崇高的地位。因爲克服自然必須依賴巧工，所以「徠百工柔遠人」也成爲中國的聖教。如印度的工藝、美術、醫藥，及其他農產（蔗與棉），中亞和南歐的曆算，都是中國所最歡迎的。所以佛教回教，與天主教能在中國流行，不僅因爲牠的教義，也是因爲他們的技術。并且中國人對於百年以還的外來信仰徒衆，也歡迎他們所帶來的新技術，和組織人力以利用

技術的方法，其他教義尙在其次。

中國因物產的關係，技術上受了限制，所謂不重『奇技淫巧』，也爲的是不能，並不是方便而禁止的。物的方面已受了限制，於是更從人的方面設法。因四千多年的教訓，養成了中國的人態度——重生也不怕死。中國固然有『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父母遺體不可毀傷，』『知命者不立乎岩牆之下，』『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等等無數重生的人生態度，同時也有『移孝作忠』『國爾忘家』『陣戰無勇，非孝也。』以及『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等教訓。

因此，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軍事上、中國都有一句可以普遍運用的格言：『天定固可以勝人，人定亦可以勝天。』而荀子更發揮『人』的重要性，他說：『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用之，孰與衣時而使之？因物而物之，孰與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

全國的交通網通信網。同時也用自已的手，和原始器具築了成千成萬里的海塘、河堤之類的偉大水利工程，平時可以『長我禾黍』，必要時更可以與敵人同歸於盡。而且也在水上修築了無數偉大巧妙的橋樑，平時可以利涉大川，戰時亦不措斷絕以防阻敵人。在北方平原旱地，鑿出許多井和溝洫，在南方的山地，開成梯田，平地則掘成狹窄不能容足的塍壟，可以阻止虜騎縱橫。如果不是這樣努力，則中國經常在游牧民族踐踏之下，由春秋戰國到秦漢的文化，恐將不能孕育成功，晉宋二代偏安之局，恐也不能保住，長江以南更不能從容移民開發。如果不是人多，就不能在物資貧乏的狀況下，完成這樣偉大的工程，也經受不了游牧民族屢次的摧殘，而中國文化必仍在苗黎夷等諸族的階段。以上所述，就是古代中國的民生大業，也就是我們古代的國防工程。

中國不是不知道器用的重要，不是不重物質，而且由易傳所說『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考工記所說『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創造發

明)也。煉金以爲刀，凝工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由此足見中國的注重物質與器用，實在無以復加，就是在武器方面，也是異常注重，其中尤以管子書爲最。現在且引兩段話：

一、「利適，器之至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不能用敵者窮，不能致器者困。」

二、「兵不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淺者同實。努力不可及遠，與短兵同實。射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饒者同實。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故入兵有數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故一器成，徒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然而若在不得已時候，器用未備，就爲敵人所棄，自然不能坐待敗亡，所以管子又說：「夫爲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爲經，得人之心而爲紀，法令爲維綱，吏爲綱目，什伍以爲行列，賞誅以爲文武。繕農具當器械，寓耕農爲攻戰，推行銚耨以當劍戟，被鎧以當鎧編，戴笠以當盾櫓，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農可習，則攻戰巧

矣。」

孟子也說：『生亦我所欲也。』明明知道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然而聽了梁惠王說：『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就告訴他說：『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管子書的道理，齊國沒有實行，孟子的說法，魏國也沒有辦到。然而周代初興時的事實，以及韓、趙、魏、田、諸族之在戰國時稱王，實是因爲他們的祖先當弱小的時候，確實作了些得當的事，自然發展到一個大國家。就是秦國的起源

，也是人少地狹。而且以後各朝代的興亡也大概可以證明孟子的話，尤其是秦、元、的滅亡，實在是以前哈卜斯堡一族，德國霍亨索倫一族，法國布朋一族，甚主英國的維廉締王一族，由很少的人，憑藉很小的地方以發展到建立大國。最近歐洲採用新政體的三個大國（蘇聯、德、意）的領導者，又何言不由少數人憑微弱的力量而起。再則最近中華民族的導師 孫中山先生暨 蔣委員長領導四萬萬五千萬中華民族，尤為最切近的實例。這正合於荀子所謂「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道是以壹人而已矣。彼其人苟壹，則其土地且實去我而適他。」「道是以壹人」又與 孫中山先生所說「革命軍是以一敵萬的」的名言相同。

4. 當前的實際問題

現在最高領袖 蔣委員長承繼中華民族四千多年來的文明精神，以 天下為

公」與「世界大同」爲大目標，以「仁愛、忠孝、信義、和平」八德爲國教，更加上「助人、整潔、勤儉、有恆」四德爲黨員守則，實在是包容了孔、老、佛、耶、回、各種教義的精華。三民主義也是概括了一切古今中外各種羣治的良法美意。蔣委員長五六年來努力提倡「力行」，現在已經確實做到「道足以壹人」，將民國成立以來二十五年所不能解決的國內「爭、離、亂、弱」的局面，一掃而空，完全達到「內和」的目的。就是在國外，蔣委員長經數年的苦心孤詣也做到「得道多助」。

經過 蔣委員長的辛勤執掌，畢竟在二十四年冬間，完成了國內和平統一，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豐功偉烈。因爲內部撫綏從來所未有的多種信仰宗門，而獲得全世界各國的崇拜，這種盛德大業，在中國歷史上尚無前例。中華民國每一個人都應當盡最大的敬意，尊重最高領袖締造和平的功德，也自然應當用全心全力，來捍衛空前的和平。

然而惟有日本，並且是惟有日本軍人中間的極少數野心家，嫉妒這個四千多年所未有，而爲四萬萬五千萬中華民族所寶愛的和平，竟在中國真心和平統一之後，剛過半年的時間，突然發動蘆溝橋事變。

日本民族和中華文化直接與間接的陶冶，費了中華民族二千多年不斷的努力，方纔有了日本史上最光輝的德川時期，因爲在德川時代二百六十年間盡力推行中華文化的結果，一個具體而微的儒教國家，養成了士習、文化，方纔漸上軌道而打好了明治維新的基礎。在日本維新事業萌芽的時候，中國正過着在尸居餘氣的滿清政府統治下，既不能和內，而又不能知人，祇知圖一家苟安旦夕，以致造成甲午喪師、失地、辱國、禍民的奇恥大辱。

就是甲午戰爭，也並不是日本本身有致勝的力量，而是英法美各國，想利用日本以制帝俄，特意選了這個不足畏的窮困小國加以支持，同時利用清政府的愚昧，就使日本借口朝鮮問題，從中國得些便宜，即各國用中國的實惠，在遠東養

一匹防俄的警犬。

日本在西邊遇着一個昏聩的滿清政府，一個好大喜功而鞭長莫及的沙皇政府，同時這兩個國家，又都不能內和其民，外和隣國，真是日本千載難逢的倖運，因此二次得志於中國，二次得耀武於俄國。然而最後一次，即應付經過大戰與革命以致殘破的俄國一部份，也遭了說不出的失敗。

正當日本過了最盛期，在西伯利亞出兵無功而中國承打倒滿清惡政之後，開始有了大覺悟的時候，而日本竟趁歐洲大戰的機會，得意忘形，阻礙中國參戰，佔領山東，提出二十一條件。出兵西伯利亞的結果，已經暴露了獨霸遠東的野心，惹起全世界的厭惡，加上民國十七年的「山東出兵」「皇姑屯炸車案」「田中奏摺」「九·一八」「一·二八」等事變，獍狺面目，已經全都暴露。外面的與國，可謂已全部失掉，雖然想利用歐洲亂局，引一二國爲同類，但徒益人而不利己，也是事實；加上「五·一五」在其國內刺殺老臣，「二·二六」實行「錦旗革

命」，又造成了其國內的亂機。然而正在這個時候，中國是恰得其反的走上舉國一致的和平統一大道。

自從「七七」，中華民族實行二千五百年來的傳統國防政策以來，日本正在多方樹敵多方暴露本身的弱點。而中國正在一天天自信自重，正在一天天陳舊佈新。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有許多在以前認為不可能或難能的事，都在短期間內迅速做到了；六朝以來士大夫的惡習，正在積極掃除，由清末逐漸喪失的民族自信，亦已加速度的回復；從日本直譯的膚淺學術，也在努力改善；中國文化受着火與血的洗禮，正在一個新機運中間，走上了新的道路。

中國的第一期抗戰建國工作，就文化上說，可稱全部勝利。即就軍事上說，我們祇失掉幾個平日已為內外冒險家所腐化、惡化，由外燦而成、受外人支配、國人久已視同萬惡淵藪、而無可如何的大都市。然而所換得的，是百煉精鋼的多數新軍，與舉國同仇、堅強的民意。所以在軍事上說，第一期抗戰建國也是勝利

的。

日本的少數軍閥的侵略精神是甚麼呢？第一我們首先要舉出日本少數野心軍閥用來欺騙其本國兒童的『桃太郎打鬼』的童話。這篇童話，在日本兒童讀本中間，佔着重要地位。這篇童話說：

「在日本一條不知名的小溪上，有一天流下一個桃子來，被一對不知名的夫婦在河邊拾了，劈開來看，裏邊原來有一個男嬰。這個無名無姓，因為是桃子裏出來的，那對拾桃的夫婦就叫他作桃太郎。桃太郎長成了，就跨小兒玩弄的大刀，問他的養父要了糰子作為乾糧，到四方去打鬼。後來居然有些鬼被他殺掉，又捉了幾個回來，得了些寶貝。」

這個童話，似乎是影射日本開國史，桃太郎正是暗指所謂征夷大將軍的幕府及大名之流，即是指現時日本軍閥所崇奉的桃山幕府豐城秀吉，又名豐太閤者，或是桃太郎童話的本事。

日本人平日極力宣傳其國民性如何武勇，實則與其民間所傳為美談的『心中』（雙雙情死）并稱而為日本武人所讚美的『切腹』，雖則是責任感和勇敢性的表

現。然而也是出於窮促島國所養成的偏急心理。因為地震不時發生，自然造成日本人的『無常』觀念，產生了一千多年來，婦孺皆知、而以『無常』思想為中心思想的『伊呂波歌』，加以統治方面的剝削，更助長一般人民的輕生思想。這種思想，在政治上發生了乾坤一擲、以賭國運的『豬武者』的政策。

日本少數野心軍人，從田中義一開始，十數年來正是發揮桃太郎的精神，行『豬武者』的政策，走上『切腹』的道路。

『尊重敵人就是尊重自己。』然而我們不否認日本人民有不少的優點，我們自己也有一些弱點，祇是我們決不是與日本大多數平民為敵，而是反對日本人中極少數的惡劣軍閥。荀子說：『無國不有治法，無國不有亂法，無國不有賢士，無國不有罷士。無國不有愿民，無國不有悍民。無國不有美俗，無國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一而王，下一而亡。』自從『九一八』以來，日本少數野心軍人，實際握了日本的政治大權，真是以『罷士』率

『悍民』，因『惡俗』，行『亂法』。就是日本的明達分子，也明明白白承認。

論起日本真正從事研究近代文化，應以一八七七年東京帝國大學創立開始，到現在剛過六十年。中國開辦京師大學雖在一九一零年，而容蕓甫先生到美國留學，實在福澤諭吉之前。中華民族因爲有四五千年的文化蓄積，態度較爲深沉，不易爲新奇所眩惑，所以對於外來文物的採取，頗爲慎重，因此接受外來文物較緩。然對科學機械技術，則曾滌生、左季高、李少荃，張香濤諸先生，均以最大力量提倡。因爲惟有借助於外國因得特殊天惠而後來居上的科學技術（卽格物致知利用厚生之學）然後可以克復中國天賦貧瘠的物質困難，纔能達到修齊治平與大同的目的。然而因爲滿清親貴的昏瞶，加以後來『悍民』不斷的侵略壓迫，中國科學技術，總不能迅速的發展。譬如最重要的粵漢川漢鐵路，就因日本分化中國政策的結果，遲遲不能完成，而爲中國初步產業發展之命脈的漢冶萍製鐵公司與水口山鉛礦，也被日本壟斷。孫中山先生倡導革命，首先剷除了滿清的

障礙，又打下根除滿清餘孽的基礎；蔣委員長廓清了滿清餘孽，同時也逐步完成了解除日本壓迫的準備，終於有『七七』以來抗戰建國的空前民族偉業。至於東北四省，也是中國科學技術、文化原料所仰給的地方，必然要放在中華民族的經濟生活集團以內，無論如何，絕不能放棄。日本侵略東北四省，實際也是阻止中國科學技術化，而永陷中華民族於農奴的地位，每個中國人決然不能容忍的。

近代科學技術的發達，影響到軍事方面破壞威力的深廣，與攻擊方面的無限制，而事業與人口集中的褊狹島國，一定難於生存。若是有供給初期工業與交通發展的原料，一個島國，因交通方便，自然容易發展近代大量生產的機械工業，與相因而至的科學研究，然而科學研究與工業發展的結果又反而促成島國的危機，這正是『天道循環，無往不復』的道理。

日本以前依賴中國才能發展，以後也將依賴中國才能生存。這是日本前定的命運。而且在目前國際情勢之下，以日本軍閥的侵略政策，決無被容許吞併中國

的可能。因爲日本本土加上臺灣兩殖民地，還不到一萬萬人口已經猖狂放肆，使全世界不安，若加中國人口與其物資必定會作統一世界的惡夢，這是每一個有理智的國家所不容許的。所以日本的生存，必須靠中國善意的援助，毫無疑義。

中國的歷史傳統，天惠地宜人事決定中國採取和平政策。而且爲民族生存計，二千五百年來，中華民族，就決定爲捍衛和平而戰。這是現代中國青年無可逃避、而且要盡孝盡忠去做的天職。我們『孝』就是承繼二千五百年來民族祖先的遺教。我們『忠』就是忠實執行這種遺教。（中華民族的最高和平理想是『大同』——禮運。達到大同的步驟，是『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學。日常的和平工作是大禹謨所說『修金木水火土穀』的六府，與『正德、利用、厚生』的三事。至于和平教養，是周禮大司徒的鄉三物的『知、仁、聖、義、中、和』六德，與『孝、友、睦、婣、任、卹』六行、及『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在目前的環境中，爲達到上述目的，其具體行動綱

領，是孫中山先生遺囑、新生活運動綱要、抗戰建國綱領、精神總動員綱領。

——著者註

八、中國青年之自信

1 自信的解釋

「自信」現在已經成了口頭禪，在不知不覺中，可以隨意奪口而出。其實「自信」一詞，若是過細求其真義，原也不很簡單。「信」字從人，從言，所以有說「人言爲信」。然而這個解釋，還是不很明瞭，要明白「信」的真意，先要明白「言」的意義。「言」字古人有寫成「一人面鼻口部份，而由口伸舌」形，說文：「舌在口所以言也別味也。」故「言」含有「定性」「形容」的意思。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名之必可言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則所謂「言」，正是表明指示一名所含性質的「詞」，如英語Qualifying Word

言』正是『名』的內涵，也是荀子所謂『制名以指實』的『實』。孟子曰：『征之爲言正也』。『正』就是『征』的實質，或本性。『征』是『名』，『正』是『言』。『言』因爲是說明『名』的『實』，所以孟子說：『言無實不祥。』孔子所說『六言，六藝』其六言（仁、智、信、直、勇、剛）正是六種性質，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正是詩經三百篇，簡單表明其實質，就是『思無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就是說：自然界的法則，可簡單表明其實質。『言』以表『實』，同時也是詞句，成了一詞兩義，所以另外加『人』字，造出『信』字，專表『實』意。孔子以名正言順爲政之先，以後按名責實，綜覈名實，還是爲政的要務，實在是合於『信』的原則。

後來『語言』與『信實』分爲兩詞，而信實的『信』又再行分化，對他說忠信，在己說誠信。在人或言，則說信實。因爲『信』是指實質或本性，引申起來，就包含固有的真實不欺，無疑不變等意義。譬如孟子說『有諸已之謂信』，正

是說：我固有之，所以是實在的。孟子又說：『仁義禮智，非由外燠我也，我固有之也。』就是說：仁義禮智，都是我所具有，可信無疑的。信既指固有，引申起來，就有如近人所說『確實』、『把握』、『堅持』、『擁護』、『固守』等義。譬如信主義，即是確實把握主義；信領袖，即是擁護領袖，信事業，即是堅持一事業；信團體，即是固守一團體。因『信』字引申起來，發生許多紛歧的意義，就另外加一字在下面，以表各種與『信』有關而各有小差的意義，如：『信奉』、『信從』、『信仰』、『信任』、『信託』、『信服』、『信用』等等都是。現在單獨說『信』，幾乎僅表『順從』、『皈依』、『託付』、『倚靠』的意思。

現在中國青年，生在這個艱難時局當中，擔負着民族與國家前途的重大責任，我們信甚麼呢？即是我們靠甚麼力量站起來呢？現在大家都說：『自力更生』，這就是靠中華民族本身所固有的力量。故所謂『自信』正合於『有諸己之謂信』的古訓。

2 中國人的自信

孔子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古人也說：『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所以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必先盡其在我，然後可以自立。孔子說：『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也是這個道理。

如何自立？孔子說：『不學禮，無以立。』可見『禮』與立國的重要。孔子以後，如國語、荀子等書，說到禮的地方非常之多，前文已經引用過，現在簡單再就各書引一兩個關於禮的辭釋，以說明『禮』與立國的關係。論語：『爲國以禮』。國語：『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荀子：『禮義者，治之始也。』『國無禮則不正。』孟子：『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先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勿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管子：『守國之度，在飾四維。……四維不振，國乃滅亡。』（禮、義、廉、恥、謂之四維）

周禮包括一切古代立國最理想的典章制度，而開篇便說：「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而師其屬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以次乃立地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司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禁，冬官司空掌百工土木。由此已經可以看出一個國家的中央政治、地方政治、教育、軍事、法律、工業等事項都包括在「禮」的範圍內，而其內容則凡立國的要政，更無不包於周禮。由儀禮篇目內容，也可以知道凡「冠、婚、喪、祭、聘、射、御、相見」都包括在「禮」的範圍內，就是一個人立身之道，都無不包於儀禮。

一個人的行爲有條理，一個大羣體內事務有條理，就是國民和國家都有軌道，如此才可以自立。因此「禮」實在就是中國文化。

禮記全書可說是「中國文化研究論文彙編」，所以闡揚中國最高文化理論的「大同」說，即在禮運篇內。而說到中華文化哲學的有中庸，說到文化實踐體系

的有大學，說到教育與治學的有學記，論音樂的有樂記，論文化思想的禮記有曲禮、禮器、坊記、表記、緇衣、經解、仲尼燕居、仲尼閑居、哀公問、儒行。而散見於各篇的文化思想亦還不少。但其他各篇所說，多是「僅於治生死」的事項，與儀禮可互相發明。關於國家制度和信仰崇拜儀式的部份，可與周禮相表裏。較爲特別的是禮記書中還有一篇，與公私治事有關的月令。總而言之，由日常生活、的日五盥、五日煙湯請浴、三日具沐；旅行休養方面的登高山、處臺榭；體育競技方面的投壺射御角力；娛樂方面的音樂，到世界大同都包括在『禮』的範圍內。所以說：『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的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

『禮』即是文化，文化的根本原則不變，而細則則以宜爲主，所以禮器說：『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宣次之，稱次之……是故天生有時也，地理有宜也，人言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王制說：『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溫、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谷；剛柔、輕重、遲速、異奇、五味異和，器械守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荀子說：『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是故文化因天時，地材、人心而不同，尤其以人爲主體。所以禮運說：『人者天地之心也』。王制又說：『中國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可見文化自然因民族而不同。

中華文字，『姓』與『性』皆由『生』字孳乳而來，正與英文 Nation (今釋民族，卽中國古文中姜姓、姬姓的姓。所以中國說民族，又說種姓、或族性。國語說：『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正合於現代優生學，須異族混血改良種族的道理。論語上說：『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正是說同姓婚姻，不合優生法則。) 與 Nature 二字之均源於『生』字而來相同。告子曰：『生之謂性』。對於字源解釋極明白。孟子說：『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歟？』

『更進一步說明了『生』與『性』二字的關係。所以現在講民生哲學，對於由『生』而來的種姓一點，自然是非常着重。孟子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及『有諸己之謂信。』則文化之應由一民族本身出發，毫無問題。

禮記中庸篇又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可見性由天命而來，即是說由自然環境與自然法則所賦予。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立也。』正是說不知自然環境所賦予的是什麼，就無以自立，就站不起來，和他所說：『不學禮無以立，』可以互相發明。因此一個民族因其自然環境不同，各有其天命，也各有其文化(禮)。

中華民族在中國的自然環境中間，積四千多年的歷史經驗，完全體驗明白中國要存在，惟有『仁義』『和平』，所以從古到今，一直奉行仁義和平的教訓。關於仁義的解釋，以董仲舒所說為最明白。他說：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

。言各以別矣：愛在人，謂之人。宜在我，謂之義。仁，主人也；義，主我也。故曰：仁者人心；義者我也。以仁治人，以義治我。」

至於和平道理，由國語中間兩段可以說明：

一、(昭公二十年)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遼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懼與我和乎？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燔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就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就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諷(奏)格無言，時康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長短、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壹焉，誰能聽之？」

二、(鄭桓公時)史伯曰：「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者也。夏禹能治平水土，以理處庶類者也。

商契能相合五穀，以保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桑蔬，以衣食人民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平良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靈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爲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聲以聽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類以濟百體，出于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厥極。故王者居九畝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

此外，在中國文化哲學上，還有『道』與『德』二字亦應加以說明。『道』從首從之，所以說『道』，首之所至也。『國語說：『唯君之馬首是瞻。』正可以說明『道』字本意。即是說：『聽你領導』，或『祇跟着你走』。因爲道有領着走的意思，一轉而爲道路的『道』，再轉而爲方法的『道』，即在英文說方法的字如 Way 及 Method，其字源也都是從『道路』而來。所以道就是方法或法則。

管子說：『德者得也』。『得』字古從貝從寸，意思相當於『懷其寶』。『貝』是古時裝飾品及錢幣，『寸』卽是手，手持貝以表示有，意思是藏於己者，

引伸爲德性之『德』，正如英文 Property，既表財產又表性質。古時字少，得與德原來都用『得』字，以後爲分明意義起見，加彳旁造『得』字，以表示獲得。又借『德』字以表藏於本身的性德。

德既表性質，所以管子說：『理國之道，地德爲首。』就是說治理國家的方法，應先明白土地的性質。因管子主張農戰，官山府海，若是地理情形不明，就不能辦到。呂氏春秋說：『春之德風，夏之德暑，秋之德雨，冬之德寒，』也是說明四季的特性。說文：『玉石之美有五德，潤澤以溫，仁之方也；體理自外，可以知中，意之方也；其聲舒暢，專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技，絜之方也。』這是說玉是石中的佳品，有五種性質。韓詩外傳說：『雞有五德：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告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這是說雞有五種性質。

因爲『道』是說方法或法則，『德』是說性質或性能，本沒有好壞，所以易經上

有「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的說法。「德」有明德、大德、盛德等等，也有兇德、慚德，惡德等等。中國學說以性善說爲正宗，所以說道德多指好的方面。然而儒家因爲注重人事，所以特重仁義。道家注重天行，所以特重道德，從而儒家便多趨重政教方面，道家多趨重法術方面。因儒家重政教，所以多說君臣五常。道家重法術，所以多說陰陽五行。儒家重人事，則尚實用。道家重天道，遂趨於玄妙。在學術方面同現在的術語來說，儒家注重實用科學，而道家注重經理科學。兩方的致力之點不同，所以儒家的歸趨是在朝市，而道家則趨山林。然而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道家不能離人事，而儒家也不能離開方法。兩方面的調和點集中在禮，因爲「禮者養也」是儒家所重，「禮者理也」是道家所重，所以曲禮說「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爲着完成道德仁義而產生的禮，因此結晶爲二大創作：

第一是說誠明中的中庸文化哲學。

第二是說天下爲公的禮運大同文化理想。

這是中華民族文化上的二大寶典。我們以中庸之道，發揚學術，就是由『博學、審問、明辨、篤行』，到『致廣大而盡精微』；由『盡其性以盡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其精神則爲『聰明睿智，寬裕溫恭，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

以大同的理想從事政教，自然要辦到『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不能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這是中國人可以自信之點。

3. 中國青年的自信

禮即是中國文化。在『禮』中間，青年有特殊地位。尙書大傳說：『子公卿之太子，大夫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

，見大節焉。』大戴禮保傅傳及白虎通則說：『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折中兩說之間，則十八歲恰當。蔣委員長所規定的青年時期的開始。

教育的科目，則保民：『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馳，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禮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軍馬之容。』大司徒：『以鄉三禮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這許多教育科目，自然是古代青年所應當學的，最顯明的地方，是除書數的科目以外，還有禮與樂。據禮記說：『樂以修內，禮以修外；』而且與體育競技生產及軍事有關的射與御，僅次於禮樂，而列于書數之上。由此可見古人注意集體生活更甚於個人智能。而大司徒的教育科目將六德與六行，列於六藝之前，則古代注重人格與行為的訓練，更甚於禮文技藝，用意更爲明顯。而文與武不分途，更是現代教育改革的模範。

此段所要說明，不僅是上列的普通教育科目，而尤其是注重適合於青年時期的大學教旨。

大學教育的科目，不見於周禮，而禮記中大學有專書一篇，比較其他各篇最爲首尾完整，條理井然。歷來儒家就大學書中敘述次序，分爲三綱領，及八條目。三綱領是『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八條目是：『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前段說過，中國民族應相信本國的文化哲學及文化理想而在受大學教育年齡的青年，自然要努力修身，認真訓練自己，將二千多年最可寶貴的文化精神，吸收融化在本身之內，以完成二千多年來中華民族祖先所遺給我們的最高文化理想——世界大同。因此我們青年對於先聖先賢根據最高文化哲學，以求完成最高文化理想而著成大學一書，應有鞏固的信仰。這就是現代中國青年應有的自信，因此本段特就大學，分項加以說明：

第一、三綱領

上而已說過，三綱領是「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這可以與章典所說：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已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相對照。「明明德」就是「克明俊德」。「親九族」與「平章百姓」，就是「親民」。「協和萬邦」「黎民於變」就是「至善」。這三個綱領，也可以說是三個段落，即是青年人修學的大目標，相當於近時所謂教育方針。這「俊德」後的意思，是大是美。「俊德」就是偉大完成的本性。「明」取象於日月，也有偉大完美的意思。美與光明不能分割，所以「俊德」與「明德」都可以作為正大光明的本性解釋。「明明德」與「明俊德」就發揚正大光明的本性。

中華民族所認為正大光明的本性是什麼？易傳說：「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道曰仁。」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所以「生」與「仁」，就是中華民族所認為正大光明的性質。其實「生」與「仁」是相因而至的。「仁，愛也」從二人，其原意取象於男女。孟子說：「庶人不仁不保妻子。」「義，

宜也。『取象於陰陽。詩經說：『宜室宜家』所以『仁』與『義』，都是『生』的原因。易說卦傳說：『乾，天也，故稱父。坤，地也，故稱母。』序卦傳說：『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中庸說：『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於天地。』因爲『仁』推而廣之是『仁者無不親也。』『義』推而廣之是『義者無不宜也。』由夫婦的『仁』推到天地的『仁』，由夫婦的『生』推到天地的『生』。這是中國古代哲學宇宙觀的一種推理。又由『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推到人應當『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明並日月。』又說偉大的人格，『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這是中國古代哲學人生觀的一種推理。總而言之，也可以說：中國古代哲學中，宇宙觀、人生觀，是含致的。因此帝典說：『堯有俊德』。而孔子說：『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惟大，惟堯則之。』舉爲偉大的人格，是取法於天。所以中庸說：『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惟其取法于天地日月，所以應該做到『天之所覆，

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孔子說：『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要做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即是莫不敬愛），自然要先『躬行』，即是『所求乎朋友先施之』的道理。因此就要『親九族』『平章百姓』以止於『協和萬邦，黎民於變』的至善。所以大學的道理，就是要叫青年從本身做好，推廣出去，一直做到大家都好，這也正是孔子『一以貫之』的忠恕之道。中庸的哲學，和大學的理想，實在也由此產生。

第二、八條目

因為三個綱領主旨，是說明一個自己及人的原則，太簡略了，恐怕青年不知道着手的方法和實行的次第，所以接着詳細的列出八個條目，並且嚴定本末次第（格物致知）八條目中『格物致知』可歸於一類。『格物』就是用器具分析事物，『致知』就是求知。由分析事物所求得的知識，正是近代語所謂『科學』。

『科學』是日本人譯英語“Science”的名詞。“Science”的字源，是『看見』或『明

白，也有『知』的意思，其原意本不就是現在分科學問。譬如 Occult Science（秘學）就包括鍊金術、幻術、占星術。"Christian Science"就是基督教徒精神治療醫法，以後由極尋常的智識技術，發展到現在分門別類，精益求精的科學，並不是因為人們腦力或方法有特別的進步，而是全世界羣治自然發展的結果。在煤鐵比較豐富，接近採取便利的地方，易於發展機械事業，與使用煤鐵的交通事業，同時也可以發展新式武器，因此世界物質，較易獲得，民族安甯，容易保障，學者生活既較安定優裕，國家社會都容易供給他們的生活，與研究材料及設備，研究結果的發展，也較容易，人民也有餘暇與餘力去領會，同時也較容易實用於生產方面，以增加財富。所以分科的學問，受了社會的鼓勵，就自然日趨進步。其實現代科學的根本，除了『格物致知』以外，別無方法。所以近代科學初入中國，前輩學者，就譯作『格致』，實在是最為合理。中國因為物質的擷取，不如歐洲的方便，尤其趕不上英倫與萊茵區域；勉強尋覓物質的結果，就免不了墨國與師

，勞民傷財。譬如漢武帝因為推銷絲織，以換取原始產業、動力用的馬匹，遂發生西域遠征，其結果是全國沸騰；為研究鍊金術和尋取藥物，也弄到全國不甯，釀成政治上的變故，畢竟以漢武帝這種英雄人物，也不能不發表輪臺罪己詔。至於漢武帝以下的人，就更不敢作這種有關科學發展的非常舉動了。何況私人，更無力量能夠辦到。因此由先秦萌芽的科學進步，總是遲緩。然而，要實現大學的三綱領，必須先用器具分析事物以求知起，則是二千多年的中國人已經見到了的。因為「格」字從木，就表器械，從各是表明分析的意思，合起來就是以器析物。

由以器械分析事物而求知，可以有兩方面的發展。一方面是分析事物以求知，就是大禹謨的「正德」工夫。「正」就是「定」的意思。「正德」是確定物性。因為大禹謨說：「金木水火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所謂「正德」恰好是確定「金木水火土穀」的性質。性質明白確定以後，纔可以利用去裕厚生。

。第二方面就是大學上所說的發展，即是由分析事物以求知，而明白人類正大光明的本性，經過正心誠意修身的工夫，加以發揚，以達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

（正心誠意）孟子說：『心之官則思。』意思是『心的官能（Function）是思想。』古人說心並不是指心臟，就人說，是指思想官能，引申之則是指思想或觀念。『正心』就是確定思想或觀念。而由格物致知得來的思想或觀念，恰是科學思想，或科學觀念。雖然確定了這種思想，仍然不能發揚人類正大光明的仁愛本性，要真正做到發揚光大的工作，還要有鞏固的意志。這就是要誠意。

意志二字，說文互訓。『誠』字由成字取『成』字意。『成』是古『城』字，正如『或』是『國』和『域』的古字一樣。『成』字古從戊，從午。戊是鉞一類的兵器，形與戈相似，午就是杆。杆築土而以戊守之，恰好是後來的『城』字。因此『成』有完固堅實的意思，加土作『城』，以指具體的堅固的工事。加『言』字作『誠』

，以指抽象的形質或動作。因此誠意正是堅實鞏固的意志。因為本身意志堅實鞏固，又解為不自欺。所以說文，「誠」與「信」兩字互訓。因為充實之後，纔能發展出去。先將人的性質都弄清楚，充實起來，推廣出去，就是「誠己，仁也。」

「將物的性質都弄清楚，不使有一點遺漏，就是『誠物，知也。』仁與知，本是生而俱來的本性，認清楚這種天性，就是美德，所以說『性之德也。』將人內在本性與外界的物性相配合，就產生了辦法，所以說『合內外之道也。』因時勢而使用辦法，就能得當，所以說『因時措之宜也。』人與物若不是包含許多性質，即無性質可指，就是沒有內容，就是不充實，也就無從認識，所以中庸說：『

誠則形』。又說『誠者自成也……不成無物。』

自然界每一個事物，本來已包含有許多性質。一件事物充分具備了他的一切性質，纔成為那件東西，所以說：『誠者，天之道也。』人本來不能完全明白事物的一切性質，然而時時努力去認識，認識之後，就將從事物認識的性質，逐一附

於事物之上，這就是『誠之者，人也。』因此『誠』與『盡性』是相連的，譬如聽、視、嗅、觸、味，都是人本身的性能，（即古語所謂德）。將這五種性能，充實、完滿、保護，發揮到極點，就是至誠，所以說：『唯天地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參天地之化育。』各個事物的性質，既已認識明白精盡，而各種事物各有不同的性能，互相影響，互相作用，就要發生變化，就是『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而且性質最充實的如極剛極柔，極黑極白，極熱極寒，極動極靜，即技術極精極粗，以致極純的東西，都是最能起變化，所以說：『惟天下至誠惟能化。』物性如此，人事如此，學問技術亦如此。這正是現代科學發明的道理。因爲科學的發展，是由於人類用了許多儀器，將人的五種性質充分發揮了，以盡物性的原因。由本身充實而發現出的叫作性，以已經明白道理或事物，使本性更充實，是教養工夫。這就是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的解釋。

總而言之，「誠」的意思是充實鞏固。「誠意」就是鞏固意志。其目的是實行「明明德」，由人的官能分析物性，纔能得到知識；由多樣的知識，纔能構成思想；由確定的思想，纔能凝成鞏固的意志，方能發為有意識的行動。這正是心理學的必然過程。

在中國「學」就是格物，也就是作事。因為「學」字從爻，從二手，從門，從子。子是人的總稱，「是象屋宇，爻（二×相重爲爻，表自然現象或事物）是表繁複的事物（現在作錯雜解的淆和樊，都從爻，易卦的爻也是說陰陽八卦錯雜中的一部份。）二手所以理××（即清理淆亂的現象或事物）。人在屋中或有掩蔽處，所以二手清理樊雜淆亂的現象或物，就是學，也就是事。

因此「格物致和」，固然要學，也要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固要學，也更要作。甚至正心與誠意，也要學，也要作。

古代關於正心與誠意的工夫如何作法呢？關於正心的工作大學上說的是：

知止而後能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止』即是手指與足趾的古字，象指和趾形，意思是末端，等於英語的 *end*。即目的或究竟。『正』字也從止，『一』表示界限，所以知到究竟目的或最終限度，就能安定。止於一個確定的限度是正，止於一個範圍是定，『正』與『定』是相近的字。說文『定 從正，安也。』正、定、安，都是同義語。明白有一個大目的，就能鎮定，就能不搖動，就能安於環境，所以能夠『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然而安於環境，並不是苟且偷安，正是要能夠用腦筋，想辦法，所以大學接着說：『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因為祇學與作，而不用腦去思考，正是易陷於『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在格物致知之後，應當有一段甯靜的工夫，去思索想辦法，這樣纔能『知所先後』，以求得到最可能的辦法。所以正心恰是用腦筋

以研究思想。由確定思想以至鞏固意志，是要有許多工夫的。第一：要由學和事中間求得許多經驗，來充實合宜思想。第二：要由學和事中間，領受許多教訓，排除許多不合宜的思想。這樣纔能明白是非好惡，纔能獲得一種意志。這種意志，要經過長時間積蓄與鍛煉，方能鞏固。因為經驗與教訓都要親身去歷練，才能真實親切，所以正心與誠意，不能離開作事而可辦得到的。

由知識與實踐以達到正心誠意，是科學的態度。由儀式與格律以達到正心誠意，是信仰的態度。大學是採前者的辦法，然而現在許多科學發達的國家，還兼採後一種態度。真實的知識、正確的思想與鞏固的意志，是用不斷的努力繼續增長的。在這個不斷努力與繼續增長的過程中要經過許多修正，所以大學說：『日新又日新。』並且也祇有在『格物致知』，為學治事中間，纔能發現自然界與社會上『革故鼎新』的原理和方法。

（修身）有了真實的知識、正確的思想、鞏固的意志，最後的目的自然就會

有行動表現出來。要行動，就有兩點要注意。第一：行動是本身發出的，第二：行動是牽涉到他方的。要達到大的目的，需有極健強的體力，以支持艱難的工作；也要以本身作模範，以引導他人共同工作。因此要作事，尤其要作大事，第一就要注意修身。

由前所說，修身有兩種意義：第一種即是衛生。這是孫中山先生對於修身的解釋。而衛生確為修身的一要義。中國古代的衛生法則，雖散見於各書，然而論語的鄉黨篇，和禮記的內則篇，比較敘述為多，於飲食衣服、起居、沐浴、盥洗，都有規定。關於體育，則周禮有射御的教育，儀禮有鄉射禮和大射，禮記也有投壺與射義二篇，（射禮不僅運動與競技而已，兼含養藝道 Sportsmanship 的意味）月令也規定『五月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登壇榭』等類旅行的修養，及十月『習射御角力』，等於競技的運動。修身的第二種意義，就是社會領袖資格（Leadership）的修養。社會領袖，中國古代叫作『士君子』。關

於士君子的修養，是儒家以最大的力量灌注的，詳細的敘述詳見論語、禮記、國語、及孟、荀諸子書，不能盡錄，然其大要已見於『鄉三物』的教養。

大學的工夫，從『格物』作到『修身』就完成了第一階段，算是基礎已打好了，就是說作到『正己』或『其身正』的地步。孟子說：『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大學也說：『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

（齊家）一個人從生到死，都離不了家庭，不僅是幼小與衰老的時期，需要人扶持，就是青年與壯年，也要有室家之好，即是要結婚。結婚是生物的自然要求，也是對於人類社會的責任。並且因爲兩性生活的健康與個人經濟生活的方便，也需要親切人們經常的互助。不論在游牧社會，農業社會，或初期的工業社會，家庭都是社會生活的基本單位。祇有在極高度發展的工業社會中，因社會分工的繁密，家庭工作都有社會的分工組織去擔負，家庭才變成一個不甚固定的宿舍。

然而極高度的工業化，已經是有利也有弊，寄宿舍式的家庭，是否也是利與害俱，現在還難有定論。

在一個手工業農業還是社會經濟生活的國度，家庭生活實在是私人生活一種最美好的互助體。因為男女老幼在手工業農業環境中，是各有分工，文化生活與經濟生活，都依賴家庭這種互助組織，纔能比較圓滿的解決。中國目前就是這種情形，就是將來也將如此。因為現在及最近的將來，國際形勢都不許可中國有英美各國那樣高度的工業化，中國的工業，大概祇能以國內消費，及在國際上行必需品的交換為目的，如超過此限度，工業也只能向「減少每個人的勞動時間，而增加各人的文化修養」方面走。如不得已，則中國的工業，也祇好分一部份力量從事國防。至於挾軍事力量向國外作投資競爭的勾當，則完全不是中國的需要。因此，若大部份人口留滯於手工業農業經濟中，則家庭互助的文化，與經濟生活，還要長期的保持。若工業以減少勞動時間而增加文化修養時間為目的，則家庭

更無廢棄之必要。而且因近代科學與工業發展的結果，影響到軍事的集中，破滅力的加強，使一國家不能採取集中的高度工業化，與過甚的私生活社會化，以致有一處受傷即刻禍害蔓延全體，所以家庭生活或家庭式的小社會共同體生活，必然還是成爲人類生活的基礎。所以家庭生活的安排與處理，便成爲成年人極重要的工作之一。縱然在國家危急的時候須要成年人，然而在國家不能完全替代私人維持家庭的時候，祇要家庭在必要的時候，不至累及兵役，或發生「老弱轉乎溝壑」的現象，則平日必須處理家事，或訓練家人，使在必要時，能履險如夷，處險若安。這種工作，也正是齊家的工作。

齊家的工作，不僅是私人的生活重要部份，而且國民經濟，或社會經濟，正是以家庭生活爲基礎或根本。「經濟」這個名詞，日本人用以譯英文 Economy 一詞，正是希臘的「齊家」。「Eco」的意思是「家」，「Nomy」的意思是「齊」，至今德文與俄文也還用本國語言的「家事」或「齊家之道」，去表示 Economy。

家庭生活與民族文化，有絕大的關係。中國的大家庭生活與父母主持的早婚制度，當時是使社會容易安定，發生安土重遷的和平文化。由大家庭的共產主義發生大同的最高文化理想。其他國家的小家庭生活，與自由婚配制，使青年人脫離老年人的指導，逞其方剛的血氣，已使社會上易發生鬭爭情形，且因生物兩性選擇的法則，更加強鬭爭的氣勢，若向外發展，自然容易使國力增強，一旦向外發展受了限制，則國內必然發生極大的不安。由小家庭的個人自由主義發生最高文化理想，自然是歐洲式的各色各樣社會主義。

中國的大同思想，是大家庭制度的擴大。歐洲式的社會主義，是個人主義的發展。兩者的出發點不同，所以達到目的的方法也不同，終極形態，也不免有些各別。

中國的國家，歷來建築在大家庭、或大家族的基礎上面，所以發生了家長式的政治。歐洲近代的國家，大概是建築在市民身上，所以發生了經理式的政治。

就是在歐美各國，仍舊時常用父母鄉土 (Vaterland, Mothercountry, Patrie) 稱呼國家，仍承繼古羅馬長老政治的精神。上議院多稱 "Senate"。但近來兩種形態的政體，似乎有些趨於調和折中，這也頗有易理「正反相生」的意味，也如董仲舒所說：「天下之道雖有不和者，必歸之於和。」

古來的國家，因為建築在大家族上面，可以說，是家族的擴大。所以家庭即是國家的雛形，也可以說家庭就是一個小國家。在這個小國家裏，必須有家長，有叔伯、兄弟、姑嬸、姊妹、子女、諸姪、羣孫——愈大愈可以具備國家的規模。因為可以包括各種年齡與各種職業的人，而且可以實行各種分工。在這樣一個環境之內，青年人自然容易養成一種處理公共事務的性能與態度，正合新的教育思想，要將學校造成社會的縮影，使青年在學校實踐社會生活一樣。所以孔子說：「書云，孝乎，唯孝！友於兄弟。」是亦為政出發之點。至於漢朝以「孝弟力田」取士，也是這個緣故。到了後來就產生了「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的政治格言

(治國)中國古代的『國』。原來就是小城市，正同於希臘的 *Polis*(城市)或古羅馬的 *Polis*(城市)。由希臘語『城市』一語而來的政治 (*Politics*) 一語，正是治國之道，因此德語至今還用與『城市』一語同源的『國家』，以代 *Politics*。近代歐美許多國家，因工商業發展，人口集中都市，所以政治還是以都市為中心。

中國到了漢代，已經以北方的長城，西方的山與東南的海，為民族定居的疆域。政府的政策也重農輕商。所以政治的重心，並不在城市。並且自秦以後將賈人與罪人同視，對於舍本(農)逐末(商)的人民，待遇極低。在政治學上有孟子征商說，以後又有商鞅李斯一流人的輕商政策。漢武帝也力獎『孝弟力田』而抑商，所以楊惲說：『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人之行污辱之處。』這種輕商態度，可謂歷代相承不改。雖然有人說：『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然而歷代都主張財富集中於國家，就是對外貿易，也由國家在賈賜的名義進行。南宋市舶

他的買分制度，就是如此。西北邊『茶馬之市』，也在政府監督下辦理的。有全國市場的鹽業，從漢代起，早經成爲國營事業。商業情形如此，都市政治自然無從流行。從而經理式的政治不見於中國，而中國只有家長式的政治。自從歐洲大戰以後，經理式的政治，似逐漸動搖，所謂都市文明（即：Civilization）這個字由拉丁『城市』一語而來）也有重新估價的趨向。而且頗有些國家漸探家長式的政治，這也是二十世紀一大變局。

（平天下）中國因爲物質缺乏與技術上的欠缺，及人力物力的組織和運用都有缺憾，以致現在的國勢，呈一種衰弱的現象。然而物資的缺乏與技術上的欠缺，都可以用現代科學的工具，逐漸補救，並且因爲中國接受現代科學，與運用動力工具，已有七十年左右的歷史，發展基礎已經大概具備，尤其是最近二十年來，學術上的進步，可以抵得上以前五十年的工夫，而五六六年來的努力，無論是在科學上或建設上，都可以等于以前六十五年的總和。在國民精神上振刷辛丑八國

聯軍以來已喪失的民族自信力與妄自菲薄的頽唐氣習，而且也糾正了辛丑以前因對世界認識不清，而妄自尊大的虛驕習氣。現在我們對於自己所需要的學問與技術，固然需要虛心的吸收，而同時對於本國的文化累積與特別國情，也正要極力認識。以後對於組織人力與物力，自然要加倍努力，憑藉本身已有的基礎，在四五年來的文化地盤上，樹立崇高偉大的新文化紀念碑。這正是我們現代中國青年，對於國家的主要責任。而且對於提高與普及文化的一切工具與機構，自然當以經濟、合理為原則，毫無成見的使其更為靈便適用。這種工作，當然既需審慎，又要迅速。實在，一切國家機能，無一不是為保障與提高民族文化而產生，一切文化累積，是為達到更高文化階段的橋樑，決不是一成不變的。

國家的成立與存在，都是為民族生存的方便，其他一切文化產物，自然也是如此。我們尊重以前民族祖先的創造，我們也要認明本身繼往開來、光前裕後的責任，尤其應為民族前途着想，這是『忠』，也即是『孝』。

我們愛護中華民族四五千年的文化遺產，同時也會尊重全體人類文化的燦爛結晶。大學說：『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大學教我們對本身採取這種日新又新的工夫，同時我們自然也聯想到『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中國現階段的革命，是一方面要保證本身的文化，抵抗外來的摧殘；一方面要重建本身的文化，以與友邦並進。所以承繼民族文化遺產，與借鏡他族文化創作，同為重建本身文化的重要方法。其實這正是孫中山先生發揚三民主義的精神，也是蔣委員長提倡新生活運動與抗戰建國的精神。我們保護本身文化，是要使中華民族四千年來的文化，在全人類的文化總體中有所貢獻，而且實在能夠自信，確有貢獻。譬如格物致知的學問，是以平天下為目的；修六府（金木水火土穀）是以厚生為目的；一切文化制度的運用，是以世界大同為目的；修道之教，是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為目的，這就是中華文化對於世

界文化的貢獻。我們愛護這種文化，正是要發揚光大這種貢獻。我們重建我們的文化是因爲我們的祖先因物質缺乏的縛束，以致不能早日完成其『世界大同』與『平天下』的理想。我們而努力創造新文化工具、新文化環境，以解除我們祖先所曾受的縛束，早日達成『世界大同，天下爲公』的境界。所以我們一切努力，都是在于完成中華民族二千多年來的國際主義——即『平天下』，也就是『協和萬邦』，也就是『世界大同』。

總而言之，我們相信帝典、禹謨、中庸、大學、禮運、大同，以及一切先聖先賢的思想所教訓我們的，是需要我們：

闡明宇宙大法，確定我們的偉大的思想。發揚人類本性，指示其光明正大的前途。繼承歷史上偉人的崇高事業，造成世界上永遠的和平幸福。這就是中華民族的古訓所謂：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九 新生活、新文化、革命

荀子說：『禮者僅於治生死者也。』除了一民族如何養生，如何送死以外，文化更沒有其他可言。所以孟懿子問孝，孔子用『無違』二字答覆他，而『無違』的解釋，即是無違背文化習慣或文化意義，所以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紀念尊崇表現）之以禮。』青年人對於長輩的養生送死，固應當合於文化習慣，就是自己的涉身處世（即是日常生活）也應當遵從文化習慣。所以顏淵問仁（即爲人的道理）孔子就教他『克己復禮爲仁』。子路問『怎樣叫作成人？』又教他『文之以禮樂。』實在文化不過是一民族共同遵守較好的生活規則，應當『生死以之』去遵守，去實行。因此古人說：『禮者，理也，履也。』也因為文化是一種生活規則。荀子說：『禮者所以正身也。』就是這個緣故。青年時期所應學習的，自然是民族生活規則，所以荀子又說：『故學也者，禮法也。』

生活必需依賴物質，荀子說「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磬，琴瑟笙簧，所以養耳也。疏房櫨須（櫨，越也）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這是說明禮（文化）與公共生活的關係。國語說：「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這是說明禮（文化）與公共生活的關係，即是調理一羣體中各個人私生活的相互關係。

文化是以民族的本質與其環境的實際狀況為依據而產生，所以說「忠（即中，意思是內容或本質）信（實，實際情形）禮之本也。」文化是由主觀需要以適合客觀環境，由自然法則而產生的生活方式，所以說「義（合宜）、理（法則）、禮之文也。」

「因此禮器說：『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工）有能也，物曲（繁多的種類與性質）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居子不以爲禮，鬼神不饗也。（卽不合自然法則，古人對於自然法則不能明瞭，則謂爲天及神鬼，如荀子所說『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故必舉其定國之數，（立國的物質情形），以爲禮之大經（綱領），禮之大倫（常法）。以地之庶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意思是以收穫情形作標準，如現時所謂國民生活應以社會生產力爲標準）。是故年雖大殺（卽是嗇、不足、歉收意），衆不匡（恐）懼，則上之制禮（規定生活方式）也節矣。（有了調節）。』禮論篇也說：『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詭，卽變化的意思，持情而合危，就是因其實際性質而合於變化）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涖者居中原而勿敵也。用水、火、木，飲食必時，合男女，狷爵位，必當年（年齡）德（性能），故無水旱昆虫之

害，民無凶飢妖（夭折意）孽（罪）。』

因爲『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不同，『是所以持情而合危』，所以一民族的文化，必須以本身的特性爲主體，不能專門採自外來。尤其是貧窮國家的生活，更不能以富裕國家的生活方式作標準。所以墨子告訴公良桓子說：『衛，小國也，處於齊魯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此外有鄭國的人羨慕邯鄲人，認爲邯鄲（當時北部最大都市）人走路的态度，是最漂亮的，就去學邯鄲人的走路，到後來邯鄲人的走法沒有學成，原來的走路又不慣了。這是一個叫作：『邯鄲學步』的故事。其次還有一個『東施效顰』的故事，是說：『東施本人的相貌極難看，而極羨慕西施的美貌，一舉一動，都模擬西施，連帶西施愁眉苦臉也去模倣，其結果是在原來的難看面孔之外，更加上一副難看的面孔。』以上的故事都是中國相傳的。不可無辨別的模倣他人，取法他人只能用三種方法。第一是『取諸人以爲善』。這就是要『擇

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在擇善而從的時候，就要做到荀子所說：「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第二是「休休有容」。這就是說：「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第三是「保合大和」。這是一方面知己，一方面知彼，將己與彼的優點和合起來，「和能生物」，從而產生更完美的優點。最忌的是「同而不和」。「依樣葫蘆」，「圖圖吞棗」的辦法。

採取他國的文化，以求進步是需要上述的三種方法。第一種就是近來所謂「接受批評」；第二種就是近來所謂「學習精神」；第三種就是近來所謂「辯證的發展」。

復次，文化的進展，是有賴於器用發明。關於器物的發明，中國有下列數說

第一：易傳的「制器尚象」說。最簡明的是繫辭上的說法：「見乃爲之象，

(見象即現象)，形(即型、模倣的意思)，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模擬自然的現象，而制成器用，即是制器尚象說。例如由蘋果墮地的現象，而發明萬有引力的法則，創出科學的儀器，供學術的用途——這是一個例證。又如見水沸汽升，而壺蓋動的現象，做其理而製造蒸汽車——這是第二證例。如看見鳥飛與魚潛的現象，而製造飛機與潛艇——這是第三個例證。這些都是應於物象而創造新器用以致產生新生活。

第二：器用生於必要說。這是墨子的說法。他說：『古之民未知為宮室時，就陵阜穴居，而處於地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為宮室，為宮室之法，曰：高足以避潤濕，邊足以圍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獸皮，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為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絲麻、拊布絹，以為民衣。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暖，夏則絺綌，輕且清。……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

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適腹而已矣。：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人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國便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墨子以爲器用的發生，都是因爲生活上的必要，然後聰明特出的人因必要而創造出來，使人民有衛生便利的新生活。』

第三：制天理物說。這是荀子天論篇所說的法。荀子最注重人力，所以說堯舜僞（卽爲人力強行的意思）也。『因此對於『天』與『物』他都主張用人力去征服而利用之，關於天與人的解釋，以莊子爲最明白。他虛擬河伯及北海若，又借河伯的口發問：『何謂天？何謂人？』他又借北海若的口答覆說：『牛馬之足是謂天落（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不過，莊子重天道，主張放任自然，不加入力，所以說：『無以人滅天。』荀子重人道，所以說：『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

而多之，孰與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忽失之也？顧於物之所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即措，如俗話說放着不管或棄置不用）。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

第四：研究致用說。這就是大禹謨「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三事惟和」的說法。也是大學「格、致、正、誠、修、齊、治、平」的說法。就表面上看，大禹謨是着重在正物德，（明定物德）從而利用之，由技術與經濟上裕厚民生；而大學是着重由格物致知，以充分明瞭，並發揮人的性能（明德）以達到平天下之目的。禹謨似乎側重自然科學，大學似乎側重社會科學，其實兩方面都同樣需要，二者兼重，因為如果要物質真能厚生，而不致害生，就需要平天下，而要修齊治平，也要能充分利用物質，以裕厚民生。

由上舉四種說法，可以知道古代中國如何重視利用自然，創造器用，使人民過一種新生活，即是古代聰明特出的人，如何注重創造新文化，以倡導新生活

，並且由新生活以制之新文化。這種新生活所需要的器用，也是因環境便利而產生的，所以說易繫辭上說：『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至賾，而擬諸其形容；象（與形相同意即是觀察）其物宜，是古謂之象。』因為一方面天行健（自然界變化很快），一方面君子自強不息（有作為的人，也不懈怠的求長進，即是在變化不停）。所以生活方面或文化方面，便不能不隨時進步；如果發現了停頓的現象便要就各方面文化會合的情形，作參考來研究，改變自己——即是改變生活法則或文化——以求能夠通而不塞；所以易繫辭上說：『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致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下說『通其變，使民不倦』（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適應環境而生存）。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因此生活法則或文化，是經常的在『動、會、變、通』中間。關於『動』：有乾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有豫的『順以動』，所以說：『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有兌的『順乎天而應乎人』，『有鼎的』柔進而上行；『有漸的』進得位，往有功；』及『君子的居賢德

善俗；』有升的『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有盪的『元亨而天下治，』及『君子以振德育民。』關於會；有師的『君子以容民畜衆；』有比的『君子以建萬國親諸侯；』有謙的『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有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及『勞謙君子萬民服也；』隨的『動而說』『出門交有功』及『隨有得；』有姤的『天地相須品物咸章，剛過中正，天下大行；』有萃的『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有兌的『君子以朋友講習』；有歸妹的『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關於變；有觀的『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及『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有賁的『觀乎天文（自然現象），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有咸的『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有益的『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有革的『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與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有豐的『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

地盈虛，與時消息。」關於通：有泰的「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志同也；有蒙的「利用禦寇，上下順也；」有同人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有睽的「天地睽而其事通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反之，不通否最壞，所以說：「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因此由易說，則「動、會、變、通、」實在是宇宙大法，也是人事大法，所以文化也是要經常反覆的在「動、會、變、通、」的過程中，纔可以說是生生不竭，「自強不息」纔能說：「日新之謂盛德」，不然則「否」。因為「否」是不能會通，「既濟」也不好，而且一種文化已經爛熟，功用已盡，就不免發生弊害，所以說：「終止則亂，其道窮也。」因此需要「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然而在「動、會、變、通、」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慎辨物居方」；不過即得到了「辨物居方」，但是如果顯前不顧後，則「濡其尾，无攸利；」如果顯後不顧前，則「

濡其首，亦不知節也。』這是說在文化『動、會、變、』而尙未全通的時候，『雜物居方』固然重要，然而前進的部分，若不顧及落後的部份，則難有利，而前進的部份，若爲落後的部份所牽累，也是沒有節度。在動而未通的時候，正是朦朧期；或啓明期，正相當於易的蒙、觀、咸、明、夷、革等象，所以教育感化的工作，極爲重要。因爲是在舊與新交替的際會中，所以需要非常努力。

現在中國的文化，因爲舊的早已爛熟了，自從春秋時代到戰國，上古的文化已經過『動、會、變、』的過程，從秦到西漢，由大小戴及董仲舒等，將中國上古的文化融爲一爐，就做到了『通』；同時西域的交通開闢了，三國時代起，南海的交通又發達了，就是印度及西亞文化流入中國，中國文化上又發生『動、會、變、』的過程，經過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到宋朝的邵、周、二程、朱、陸等理學大師，將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融會貫通，又告一段落。然而，接着就有元代的開拓歐亞交通，故西亞的回教文化，和歐洲的基督教文化，大量的

介涉到中國，馬可波羅一類人物又煽動歐洲人東來的熱望，第一步就有明末清初歐洲文化的開始東移，有德國萊伯尼茲和法國羅俄等，對於中國文化的初步了解。自近百年來，西方文化洶湧而至，中外文化接觸日繁，一方有譚嗣同等，極力在中國作吸收西方文化的工作，一方有辜鴻銘等作宣揚中國文化的努力。而孫中山先生融會貫通中外文化的努力，尤其偉大而神聖。三民主義，已經有各國文字的譯本，由三民主義，中國人既消化了現代的西方文化，也由三民主義，西方人必然可進一步了解中國文化。中國的著作，對於西方的影響，自然沒有一種趕得上三民主義。

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包括本身的儒道兩教，而又可兼括印度的佛教，與亞洲西南部及非洲北東南三部的伊斯蘭教，所以中國文化，實在可代表東方文化的精髓。）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西方文化的精神，是「科學技術與工業制度」。所以中國文化可說是側重「人與仁」，西方文化可說是側重「物與知」。

然而由科學技術相因而至的工業制度，大大的改變了人類生活，即改變人類文化，而且這改變是非常的深切而急劇，就是中華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不能不隨着變化。這就是中國變法運動，革命運動，新文化運動，新生活運動的由來。

一個國家要技術與工業制度發達，首先需要國內和平，這樣才能有計劃的研究和建設，因此有民治主義。民主主義的中心原則，不外是『計算頭顱，以免打破頭顱。』其次，欲求大規模機械生產，需要有經常而安全便利的運輸系統，和固定而生活習慣大體相同的廣大消費羣衆，所以必需發展國家主義。科學機械與科學產品的運用，需要勞動者及消費者對機械與科學有相當的了解。因此需要普遍的提高國民的智識。而且機械工作的大量生產，需要全國人民大量去消費，所以須要提高人民生活的水準；並且國內和平的保持，需要人民有政治的覺悟，所以需要加緊人民的政治訓練。機械的運用，和產品的分配，需要人類的行爲有秩序而後纔能整齊迅速而無浪費，所以需要人民有良好的組織——這樣就自然發生了

社會主義。這就是十八世紀科學機械發明以來，改變人類生活，支配人類文化的三大主題。

這三大主題壓迫到中國，首先有取法日本明治維新的企圖，自上而下，以從事改變人民生活的維新變法運動，其努力方向，以獲得統治方面的政權運用為主，所以其結果是戊戌政變。其次就是取法英法美的民間經濟力量為基礎的革命運動。再後就有以學校及新聞紙為根據，從思想方面致力的新文化運動。

「企圖獲取原有統治方面的政權而運用之」的變法運動，因無民間的廣大組織與力量作基礎，不能抵抗政府中根深蒂固的舊勢力的壓迫，所以戊戌變法與寄生於北軍閥下的國會政治，都歸於失敗。

中國的新興資本主義發展期短，力量薄弱，革命運動，也常常因原有政權與外力的結合而被壓制，或由單純的外力干涉，而受嚴重的打擊。初期的民主政治與國家主義，是這樣地受了挫折。含有社會主義意味，自下而上的革命，也因本

身先天的條件不備，與環境的不許可，而畢竟難有成就——這不待民國十三年後事實上努力的結果去證明，卽十三年前的思想運動，也可以看出不易生效。

孫中山先生積一生努力於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經驗，到晚年乃完全確定了三民主義的內容。目的在因勢利導的，將中華文化引上新的途徑。

十三年前民主政治國家主義及社會主義思想的無成就，固然有許多原因，而主要癥結所在，就是因為中國原來最高度發展的手工業農業的公私生活方式與原則，不易與科學機械工業所養成的公私生活方式與原則相合。

但是科學（格物致知之道，與機械工業高度發展的利用厚生之術，）本來是中華民族歷來所嚮往的，尤其是因為中國向以仁德爲最高的人生法則，以致人口衆多，人多就不能不講條理，以求其不亂，所以極重禮義之教，恰好由這一點，發現了中外文化的共同點，因此就可以加以會通。

因爲如此，所以最高領袖 蔣委員長發起了新生活運動，以「禮義廉恥」爲綱

目，而輔之以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和節約運動，使中國新文化，可以在每個人的生活上打下堅固的基礎。固然，科學與機械可以養成新的生活方式，而新的生活方式，也可以便於運用科學與機械。以前我們中華民族，因天賦受物質條件的限制，不能由本身產出高度的科學與機械；目前我們又因外來的約束，使可以自外來的科學與機械，不易發展。然而我們經過幾十年來的努力，對於科學與機械的運用，已有了相當素養而作為基礎，一旦有十年二十年的良好環境，我們便不難借助於新的工具，以最大的速率，於最短的時間內，迅速發展。祇是生活習慣的養成，必需長期的訓練。所以，在外面的縛束未能完全解除的時候，先鍛練本身的新生活條件，同時努力造成合適的時機，這是新生活運動極重要的意義。

所謂文化，原來就是有規則的生活。生活上使用的工具愈多，生活愈加方便，人事的接觸愈多，文化就愈高。科學是以發明工具、改善工具、便利生活為研究的主要目的，即如理論科學，表面上雖覺離實際生活稍遠，然而只要是真的理

論，其影響於人生也必然極大。譬如物理學上的萬有引力論、相對論、電子論上不可入性論、階力論、同性相拒異性相引論等等；化學上的親和力論；生物學上的進化論、生存競爭論、與互助論；以及由一切自然科學理論所引出的自然辯學法，無一不與近代文化即人類生活，發生最大影響。這正是中國『天人通』和『學貫天人』的道理。自然科學是條理整然而規律極嚴，不容絲毫紊亂的，中國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無一不主張『法天』，即是取法於自然，所以儒家所重的『禮』，道家所重的『道』，法家所重的『法』，無一不主張『惟精惟一』，同時又主張『和合參驗』，這就是科學的精神。

總而言之，科學是因嚴格的『分』與『理』而產生，即是由極嚴整的規則而產生。由科學而來的機械，自然也是規律極嚴，不容絲毫紊亂疏忽，否則就要發生重大的危險。這種規律整嚴的科學與機械，經常與人生相接觸，若是人不遵從其嚴格的法則，必然要受到極大的危害。『禮』正是嚴格的法則或規律，所以詩經說；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墨子說：「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荀子說：「食飲衣服，居住勸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滔生疾。」這種古訓，在科學與機械所構成的近代生活中，最容易體念明白。譬如使用由科學發明以無生命的動力駕駛的交通工具，不按法儀固然不成，如果不按交通規則行駛，則不免要「觸滔生疾」了。所以最高領袖 蔣委員長訓示吾人：「禮是嚴嚴正正的紀律」，這正合於在科學工業社會中，生活上所必需具備的最重要條件。

要遵守嚴格的紀律，必需能制御自己。「義」是「正己」，也是「克己」，所以孔子認為做人的道理是要「克己復禮」。正己與克己就是說犧牲本身一部份的自由，以認公共的幸福，然後本身才能生活於公共之中。譬如在機械交通工具盛行的地方，走路不可任自己的高興，東西亂闖而需要遵守交通規則，及交通警察的指揮，這就是顯明的實例。最高領袖訓示：「義是慷慨的犧牲」。

發展科學研究和機械工業，首先需要完密的設備即是要求大量的資本。而且科學日日進步，技術也日日更新，機械需要隨着科學技術的進步隨時改良，纔不致落後。而改良機械也需大量資本，所以資本的累積和集中，是科學工業發展的先決條件。關於累積和集中資本的方法，以往常常不用廉潔的手段，以致有『財產即贓品』的譏嘲。二十世紀新國家的累積和集中資本，都是用公共的力量，實行國民的節約而來，可以說是新興的國家，不論其政治理論如何，大概都是實行『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及『生之者寡，食之者衆，爲之者疾，用之者舒，』的道理。而且有的國家實在實行墨子辭過與節用的道理。周書旅獒原來就說過：『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荀子也說：『強本（本，指生產事實，古代中國以農爲主要生產事業，所以以農爲本，而以商爲末。）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孔子對禹無間然，是因爲禹能『卑宮室，而盡力於溝洫；』衛文公轉弱爲強，是因爲能夠實行『

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而且孔子也說：「禮與其奢也，甯儉。」中國古訓說：「勤能補拙，儉以養廉。」「勤」是不浪費時間，「儉」是不浪費物力。也惟有勤儉纔能累積集中資本，以供發展科學與機械工業之用。所以最高領袖訓示：「廉是實實在在的節約」。

禮記說：「四郊皆壘，此鄉大夫之恥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恥也。」又說：「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即名之必可言也的『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孔子說：「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中國因爲物質條件的限制與外物的束縛，既在科學與工業方面有許多「不若人」的地方，這是顯明的事實。而且因爲科學與工業及內外的限制，以致許久以來，官職名位與言行，都難於做到切實相符，以致有「地廣大而荒不治」與「地有餘而民不足」的情形。並且因爲科學與工業難於發展，國力也「不若人」，使僣

略者更得乘間而入，就有『四郊多壘』的現象。也因為不能運用科學與機械，以補助人力去開發物力，以致他國衆寡不如我，而國力反倍於我，並且敢公然背叛我一凡此種種，自然都是中華民族現在的恥辱。『恥辱』二字，語源學上的解釋，已經在前面說明，即原來含有被征服爲農奴的意味。日本數十年來都束縛着中國，不能自由發展，已經是中國的羞恥，『羞』的古字是『丑』字象手和械形，華乳爲械扭之扭，即枷手的刑具，所以受束縛，也是羞，『近年來更公然要求中國農業化，顯然是視中華民族爲被征服的農奴，天下恥辱實無過於此。』知恥近乎勇，『古人『明恥』即以教戰，所以最高領袖訓示：『恥就是轟轟烈烈的奮鬥。』

『禮義廉恥』是我們的國教，是我們實行新生活，發展新文化的根本精神。平時的生活，固然須遵守『禮義廉恥』的教訓，而爲非常之備的軍事，尤其需要『禮義廉恥』的訓練。因爲軍事即是集中一民族平日所累積的一切力量，以應

付非常之危難的準備，即是要將平日的力量嚴格組織起來，而極集約的使用，以爭生存。所以軍事，實在是一個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頭，最標準的生活方式。如果遵照最高領袖的指示，平時能遵守『嚴嚴正正的紀律』，實行『慷慨慨慨的犧牲』，厲行『實實在在的節約』，發揮『轟轟烈烈的奮鬥』，則戰時自然可履險如夷。其實，就是說要『居安思危』，就能『臨難不苟』，這不但祇是限于軍政界，而在民族生存競爭極烈的今日，也正是民族中每一份子所應有的素養。即是發展和平的科學與機械文化，也要有『嚴嚴正正的紀律』，慷慨慨慨的犧牲，實實在在的節約，『轟轟烈烈的奮鬥』，才能達到目的。

中國地理條件是：內為一礦物資源與森林分佈不便於發展初期科學與機械的大陸國，四圍除一個接受外來文化較便而物資恰足以接受初期科學技術發展粗淺機械工業的高國（日本）以外，大概都是不便於早日產生近代文化的地域。這種情形規定了中國長期在手工業農業意識下的政治組織統治之下，也規定了中國有

一時期受隣近島國的限制。實在這也不僅中國如此，參照近世歐美的情形，英倫之於歐洲大陸，紐約之於美洲大陸，也有些和遠東兩國情形近似。

然而，近代科學與機械的發展，影響及於軍事方面，則島國性的文化區域，包括島國與大都市，都在需要重新估價的情形中。因為近代科學與機械的發展，已到了能從極遠的距離，以最短的時間，用極精的運輸器具，攜帶毀滅力極強的科學威力，集中破壞一密集的人口中心地。所以凡是面積小而人口多的島國與大城市，往後能否繼續維持其存在，實在是值得嚴重考慮的問題。因此，今後人類文化，不僅是促進中華民族加速的改變其生活方式，而且正嚴厲的教訓世界島國與大都市的文化，即是批判了文明 (Civilization)，而重新在考查文化 (Culture) 的真價。

所謂加速改變生活方式，嚴格批判歐美文明的舊制，實在正是一種革命。這兩種性質的革命，今後當然要同時進行。所以中國不僅是以歐美文明的舊制為

標準而行革命，並且中國的革命，也負有促進世界新文化運動的責任。這就是說中國往後的革命，不僅不能完全同於他國往時的革命，而且必然的，是以中國式的革命，與他國的新文化相和合，而齊驅並進。在這種新動向中，需要最優越的理智去理解中國、同時認識其他國家。

孫中山先生在五十年前倡導中國革命，即以『地盡其利，物盡其用，人盡其才，貨暢其流』為號召；口號既然不同於歐美各國革命時所採用的，則其對於中國的認識，自然也不是與他國一律。中山先生晚年，完成三民主義的演講，尤其顯然說明民族主義不同於國家主義(Nationalism)民權主義不同於民主主義(Democracy)，民生主義不同於社會主義(Socialism)。固然三民主義的中心，是以發展科學與機械而利民生為主，然而中國的科學實在是以『格致』為目的，和單純以滿足求知慾為目的的科學，與牟利為目的的機械企業不同，而是以『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為究極。這也是中國文化的特點。因此新生活也不與文藝復興(

(Renaissance) 相同，是以『禮義廉恥』作骨幹。所以中國所需要的新文化，也不能說是一種 Civilization，頗有些近於 Culture，而自有其『禮樂』論作根據。從而中國的革命論，當然也不僅是對於國內的暴君，或國外的統治作鬪爭，而且有『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順天應人』的使命。

改變中國的舊生活而勵行新生活，固然以發展科學與機械為主。（實在是應說『以格物致知，利用厚生為主，』更爲恰當），同時我們要知道這不過是觀歐美文化與中華文化之會通。另外，我們也要注意，自從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接觸，精神上雖然相合無間，事實上並沒有創出文化物質基礎——森林。中國文化與阿拉伯文化，也接觸了一千四五百年，而且中華民族，也沒有普遍獲得阿拉伯文化的物質基礎——畜牧。這正如我們接觸近代歐美文化的物質基礎——金石水火，是一樣的。

惟其如此，所以我們對於中國文化的物質基礎，（這即是中國的本德，）——

火土與五穀！固然需要充分發展，而對於森林、畜牧，及金石水火，也應當隨時注意。現在政府已定孫山先生誕日作植樹節，並且我們也有五一的勞動節（當然以科學機械的工業勞動為主），我們也有新近成立的騎射會。然而我們實在也要認清水利、農業、畜牧、礦產、機械，不僅是一種簡單的技術問題，也還有深刻文化的意味。其實，中華民族的新生活，是要在原來以水利、農耕爲主的民主生活之外，加強森林、畜牧、金石水火的重要性；也即是在原來高度發展的手工業農業所孕育成的中華文化之中，盡量滲入以森林爲背影的印度文化，以畜牧爲背景的阿拉伯文化，及以金石水火爲基礎的歐美近代文化，將手工業、農業、森林、畜牧、金石水火諸種要素，合理的培養、調整、開發，使用於日常生活之中，則中華民族新生活的物質條件，方纔能夠具備。所以最高領袖既提倡新生活運動，而同時即發起節約運動與國民經濟建設運動，領導國人以全力注重於各種新生活物質基礎的開發與培植。

總而言之，中國的革命，實在是由於『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這原來是和平事業，然而若遇了壓力，則其前進向上的偉大的力量，鬱而不伸，自然不免發生可恐的爆烈性。這正是易經所以在鼎革則說柔順，而在屯蒙、明夷，反說險難的道理。因為鼎與革都是求通達——鼎卦說：『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革卦說：『文明以說，大亨以正，』亨通也，所以柔順。而屯（即停頓的頓字所從出），蒙（古文即門字，與冥頑及晦冥之冥等字，皆從門，孳乳，蒙蔽，朦朧，朦瞶，諸義，皆從門），明夷（夷，即滄溟古字，所以易序卦傳說：『夷、傷也。』）都有光明受妨礙的意思，所以險難。

因為如此，所以在鼎革的時期，不可不有最賢明的領袖，以免有屯、蒙、明夷之厄。

十、現代青年之幸運

孫中山先生倡導革命，在本國無所師淑，惟內承洪楊遺緒，外法日本維新及法蘭西革命，而當時中國既無現成的革命組織，即原有秘密結社，亦已殘破不全。建國方略、三民主義及建國大綱，至晚年才完成此項著作，故直至中山先生去世時，國人思想猶復龐雜，內爭頻繁，青年徬徨，無所適從，迷離顛沛，極爲可憫。

幸自抗戰軍興，三民主義已成爲國人最高信仰，蔣委員長已爲國人共戴之最高領袖，主義與領袖已定于一，國民黨主持政權的政府，又已爲國人所擁護，此外又有抗戰建國綱領，及全國精神總動員綱領，以爲國人思想行動的南針，所以現在的青年，來從事革命救國與打倒不平及從事民生建設，已有確立的途徑可以遵循，較之從前方便很多。況且現在已由蔣委員長親自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以從事三民主義之具體實現，實行新生活，以完成抗戰建國之大業，近代青年，尤其可以在最高統帥領導之下，遵守一定之軌道，以發揮其天賦之材力，何

如幸之。

茲將各項重要文件列後以作全國青年之圭臬：

- (一) 抗戰建國綱領
- (二) 新生活運動綱要
- (三) 精神總動員綱領
- (四) 三民主義青年團宣言及團章